遺老書法與新出土書法材料
—— 二十世紀中國書法發展的契機

張惠儀*

【摘要】滿清皇朝的覆亡，標誌著新時代的來臨。能夠延續傳統並結合新時代環境對書法發展作出貢獻的，當以「遺老」爲核心的書法家群爲代表。然而，過去的研究僅針對遺老鬻書的風尚，其於書藝上的成就也只被視爲清代碑學的餘緒，未能把遺老書法置於與時代相適應的文化環境中作出討論，更未能凸顯他們結合新出土書法材料所開創的新風尚。甲骨、漢簡乃至敦煌經卷這些出土文物爲二十世紀書法發展的重要材料，對書法審美及創作影響巨大。正是生活在新舊時代交接點的部分遺老書法家率先參與甲骨文、漢晉簡牘等新出土書法材料的整理與研究，不但形成新的書學觀點，也建立起新的書風，爲二十世紀中國書法的新走向奠下基礎。

關鍵詞：遺老　遺老書法　二十世紀中國書法　新出土書法　甲骨文　漢簡

一、緒論

滿清皇朝的覆亡，標誌著新時代的來臨。而能夠延續傳統並結合新時代環境對書法發展作出推動和貢獻的，當以「遺老」為核心的書法家群為代表。可是，由於「遺老」的身份，使他們長期被視為「保守」、「落後」的象徵，失卻應有的歷史地位。自民國開始有關遺老書法的討論，多屬散篇記錄或以傳記、短評形式，根本未具系統。雖然在二十世紀末有所突破，① 然僅針對遺老鬻書的風尚，而其於書藝上的貢獻也只被視為清代碑學思想的餘緒，未能把遺老書法置於與時代相適應的文化環境中作出討論，更未能凸顯他們結合新出土書法材料所開創的新風尚。

誠然，遺老鬻書是民國年間相當普遍的現象，這不得不從遺老的身份說起。遺老多為前清翰林，都是文人出身，他們在過去主要靠官俸為生，但在清室覆

＊香港中文大學藝術系

① 二十世紀末，以陳振濂首開遺老書法家的重點研究，他在1993年發表《民國書法史論》一文，明確提出「遺老群書法」。陳氏提出「遺老群書法」的概念深具啟發意義，並把遺老書家置於更廣闊的文化環境作論述。見陳振濂，《民國書法史論》（上篇）。《書法研究》，1993年第2期（總52期），頁74。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ｱiIfｻ･､､･indd　163　2005/12/5　､U､ﾈ 05:31:04

亡後，已無此生計，賴以維生的只有僅餘的傳統學問和一手好書法。以他們作為前清狀元、翰林、太史的手跡，有足夠的賣點去吸引顧客，故不少遺老以鬻書為生。從不少鬻書為生的遺老而言，他們的書法有些的確只屬清代「館閣體」的遺風；部分其後兼習碑刻的遺老，其書法也只是清代碑學的餘波。然而，這並非歷史的全部，以上海為活動中心的部分遺老書法家在金石鑒藏，以及對新出土書法材料的研究與書風的參照，曾締造重要的成果，使遺老書法與二十世紀的書法產生作用和影響。

二、民國時期遺老金石收藏文化

基於政治因素、文化身份與心態上的認同，使遺老成為一個內聚力極強的群體。清亡以後，他們漸漸聚居於某些地區，形成聲氣互通、交往頻繁的圈子。從地域而言，他們分佈在全國各大都市，尤其是一些不受民國政府管轄的地區如上海租界，德屬的青島租界，英、法等租借的天津，乃至當時已是英國殖民地的香港。當然，遺老圈子的結聚，對於「復辟」活動的策劃，②或是「遺老文學」的形成，③都曾對民國年間的政治及文學產生一定影響。至於書法發展方面，部分遺老致力金石書法收藏，參與新出土書法材料的整理及研究，並進而創作實踐，遂奠定二十世紀書法創作的新走向。而這方面的成就，顯然與民國期間以上海為活動中心的遺老書法家關係最為密切。

儘管許多遺老在晚清時期已開展了對金石收藏的興趣，然清亡後遺老圈子的結聚，又令這種風氣更趨熾烈。部分遺老對金石藏品的大規模整理研究，更是在民國年間才展開。因此時對遺老而言，金石收藏研究已不僅是一種學問追求，更是一種心靈慰藉。研究金石文物、著錄碑帖藏品以遣餘生是其主觀的選擇，試看葉昌熾(1849-1917)國變後的自述：

> 天傾地圻，何以聊生，不得已，仍以邠帖自遣，摹宋仲宏詩一通畢……④

國變後的葉昌熾，已是垂垂一老翁，能遣餘生者，惟校勘碑刻，偶爾臨作而矣。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②有關遺老參與「復辟運動」之詳情，見胡平生，《民國初期的復辟派》（台北：學生書局，1985）。

③見胡懷琛，《上海學藝概要》（三）。《上海通志館期刊》，1934年第1卷第4期，頁1094。

④葉昌熾，《緣督廬日記》辛亥(1911)九月十九日（台灣：學生書局，1964），頁502。

ｱiIfｻ･､､･indd　164　2005/12/5　､U､ﾈ 05:31:05

繆荃孫(1844-1919)亦如是：

> 詔下遜位……自是卜居滬上，慨歎滄桑，杜門不出，惟以書籍遣日，整理舊著，四方知舊，大都避亂來滬，訪書問字踵接於門…… ⑤

可見遺老對金石文物的整理研究，固然有沿襲舊日之風，但畢竟國變後已無官職纏身，加以年紀老邁，可遣餘生者惟金石碑刻而已。而羅振玉(1866-1940)與王國維(1877-1927)對金石收藏的大規模整理研究更可說由清朝覆亡所促成。羅振玉自述「四十官京師，見聞益廣，顧以人事旁午，不復能如里居時之閑暇，雖亦從事著錄，而時有作輟。」⑥可見晚清時期羅氏尚以公務奔走，於金石研究難有特別建樹。直至「丁國變，萬念都絕，避地海東時，第以著書遣日而已。」⑦羅氏乃聯同王國維對藏品進行深入研究，而王國維的學術道路更因此而轉向。

清末曾是金石碑版集散重鎮的北京，雖然仍具一定地位，但到了民國初年上海的重要性正急速躍升。⑧上海收藏活動繁盛，與上海在近代以來之經濟、文化地位的提昇有密切相關。由各地而來的南北商賈、舊僚百官、遺老遺少、洋行買辦，各式人等，五方雜處。⑨江南一帶的文人名士，亦陸續聚於上海，多居租界之內，至使租界人口增激。⑩活躍於當時上海收藏界的龐元濟(1864-1949)於《虛齋名畫續錄》分析其中原因：

> 邇年各直省故家名族因遭兵亂，避地來滬，往往出其所藏，或作題襟之助，或爲易米之思，以余粗知畫理兼嗜收藏，就余求售者踵相接。⑪

---

⑤夏孫桐，《繆藝風先生行狀》。錢儀吉等，《清代碑傳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頁1317。

⑥羅振玉，《雪堂金石文字跋尾》序。《雪堂自述》(江蘇人民出版社，1999)，頁139。

⑦羅振玉，《貞松堂吉金圖》序。同上，頁151。

⑧繆荃孫於記述琉璃廠之興衰時曾談及民初琉璃廠盛況不比當年：「甲寅(1914)秋日，重作京華之行，時時閱廠舊肆，存者寥寥晨星，有沒世者，有閉歇者，有易主者……世風之變，日趨日下，不知所止矣。」見繆荃孫，《藝風堂文漫存》附錄(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73)，頁444-446。

⑨宋路霞，《百年收藏 —— 20世紀中國民間收藏風雲錄》(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1999)，頁195。

⑩上海人口從二十世紀初的數十萬，劇增至抗戰時六百萬。

⑪龐元濟，《虛齋名畫續錄・序》。載《中國書畫全書》(十二)(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1998)，頁624。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ｱiIfｻ・、、・indd　165　2005/12/5　、U、ネ 05:31:05

羅振玉亦指出：「此間若劉惠之、劉聚卿等均大收吉金」。⑫其實，不僅劉體智(1879-1962)、劉世珩(1875-1937)，近代金石碑刻收藏大家楊守敬(1839-1915)、繆荃孫、葉昌熾、劉承幹(1882-1963)、張鈞衡(1872-1927)等皆於民國初年寓居上海，以上海為其藏品流通及聚散的根據地。

民國五年(1916)，羅振玉在致王國維信札中鼓勵當時居上海的王氏多購書畫文物，且認為「滬上為無盡藏，但有財力者，歲可得寶無限。」⑬ 反映上海書畫文物雲集，收藏活動蓬勃。當中以端方，(1861-1911)有如山海之富的藏品的聚散在遺老圈中最為矚目。端方於辛亥革命中被殺，身後碑帖及部分藏品散落於遺老手中，民國初年逐漸於市場流散。⑭這些收藏活動與遺老密切相關，原因明顯不過，就是他們擁有相關的學問、共同的品味和緊密聯繫的社交圈子。他們有的作藏家，也有是賣主，亦有作中介人，更有為耳食者奔走(即替人當顧問)。由於他們的活躍，把上海的收藏市場及收藏素質大大提高。

辛亥革命後，羅振玉及王國維雖移居日本，仍常與國內遺老鴻雁往還，⑮當然以與上海藝友交流最密。友人亦常郵寄各種新出土金石碑刻拓本，⑯海上友人亦有托羅氏於海外搜求碑帖書跡。⑰通信之外，羅氏亦常作滬上行。留滬期間，談文論藝乃常見之事。民國四年(1915)，羅氏到滬與眾友聚舊，亦以觀賞碑帖為

---

⑫王慶祥、蕭立文校注，《羅振玉王國維往來書信》(1914年3月31日)(北京：東方出版社，2000)，頁15。

⑬同上，頁168。

⑭詳見鄭孝胥著、勞祖德編，《鄭孝胥日記》(北京：中華書局，1993)及王慶祥、蕭立文校注，《羅振玉王國維往來書信》二書之記載。

⑮羅振玉《遼居稿》序謂：「自避地以來，海內外知好多郵書存問，並徵近著。」見《雪堂自述》，頁146。

⑯羅振玉致信王國維謂：「昨景叔〔鄒安〕寄一鐘、一鬲、一秦量拓本來，又言有永安鏡甚佳。弟告以四件弟皆可留，請代購，價請酌定云云。其中秦量甚佳(未索價)，鬲雖不精，乃新出土品，索價百五十元。」王慶祥、蕭立文校注，《羅振玉王國維往來書信》(1918年1月16日)，頁331。

⑰如沈曾植曾囑羅振玉代「覓山谷手跡」，羅氏遂向日本田中氏求得黃山谷兩墓志玻璃板本寄贈沈氏，且認為此卷實為傳世山谷墨跡之最可信者。見王慶祥、蕭立文校注，《羅振玉王國維往來書信》(1918年6月17日)，頁379。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ｱiIfｻ･､､･indd　166　2005/12/5　､U､ﾈ 05:31:06

主。⑱他自該年回國後，以後「歲輒一至滬，或二至、三至。」⑲可見羅氏雖移居日本，然與海上遺老從未疏離。王國維則於民國五年(1916)回滬，加入上海遺老行列。眾所周之，王氏留日期間以羅振玉大雲書庫藏品作為研究依據，即使民國五年(1916)後回滬，羅氏仍經常義不容辭地向王氏提供各種金石拓本，其中一次通信中可反映情況：

> 弟所藏三代禮器，公無墨本者，祈一檢《吉金圖錄》，有未備者，示知，拓奉可也。⑳

作為研究考證金石文字的基本條件，尋訪、摹拓以及相互交換、饋贈碑刻拓片，在遺老金石及書法家中蔚然成風，使訊息的交流、更新和研究的真確性和深度亦大大提昇。在這種風氣的籠罩下，產生出一批以收藏金石文物著稱的遺老收藏家。眾多遺老金石書法家聚首一堂，加上源源不絕的新出土書法材料，亦可消息互通，彼此饋贈；舊日所藏則覓主求售，或請名家題跋，或走訪互觀，藏品藉以再次流通，促成了金石學的再度復興，談文論藝風氣極盛。其中李瑞清(1867-1920)與楊守敬亦得以經常論書，李氏記載：

> 辛亥國變，余黃冠爲道士，鬻書滬上。先生(楊守敬)亦避亂滬上，同鬻書。每過從，論書忘昕夕。㉑

正如王國維致信繆荃孫時提及「惺老(楊守敬)、乙老(沈曾植)均在滬上，當不苦寂寞」。㉒當然，不單楊守敬、李瑞清、繆荃孫、沈曾植(1850-1922)，其他眾多遺老亦因地理空間的縮短，締造了更多論藝的機會。

---

⑱羅振玉於《五十日夢痕錄》記：「(1915)三月朔，上午培老來談，並約至古渝軒午餐，坐客為李梅庵方伯(瑞清)。午餐後同至李君博生(翊煌)寓舍，觀所藏宋拓淳化閣帖殘本三冊……是日又聞王聘三方伯(乃徵)、胡樞堂侍御(思敬)近並在滬上，隱於黃冠，皆予舊識也。」見《雪堂自述》，頁88-89。

⑲羅振玉，《集蓼集》。同上，頁44。

⑳王慶祥、蕭立文校注，《羅振玉王國維往來書信》(1918年2月11日)，頁345。

㉑李瑞清跋楊守敬《手書題跋》。見《楊守敬集》(八)(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1988-95)，頁1151。

㉒王國維，《王國維辛亥致繆荃孫札》。《王國維學術研究論集》第3輯(上海：華東師範大學，1990)，頁444。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ｱiIfｻ･､､･indd　167　2005/12/5　､U､ﾈ 05:31:06

羅振玉在致繆荃孫信中認為民國初年金石學發展大備，臻至歷史上的高峰：

> 金石之學至今日而極備，然衰歇即在目前。碑版得長者箸錄，玉擬聿力於古金文字以及龜卜陶鎛泉布，爲集古遺文。平生搜羅此種拓本四五千通，昨得鬱華閣金文拓本，始知才當敝藏四分之一，可見搜輯之難。編輯流傳爲刻不可緩之事，但措大無此力耳。如何如何。㉓

羅氏認為「金石之學至今日而極備，然衰歇即在目前。」總結了民國初年金石學的發展概況，這發展無疑與遺老的推動密切相關。但隨著遺老們的漸漸老死，退出歷史舞台，金石學的發展亦漸趨衰落。故此，遺老生活的民國時期是一個重要階段。

由此可見，遺老的學問根基和文化口味，使其在民國時代發展成一個特殊的文化學術空間，加上適逢其會地遇上了文物出土的高峰，對於各種出土的文字材料，他們除了能具備足夠的文學、史學和金石學知識去參與研究外，更能在書法的審美基礎上，進一步拓展這些新材料的可塑性。正是由於歷史條件和文化條件的配合，遺老書家在此特定的時代和書法發展進程中，擔當起重要的角色。

三、由置身碑學大潮到碑學的反思

遺老成長的清代晚期，是碑學持續發展的時代。誠然，在晚清時期漸見端倪的新風，其基礎仍是碑學。隨著大量鐘鼎彝器和碑版的出土，甚至殘碑斷碣亦陸續被發現，金石碑版的整理與著錄蔚然成風，對書法的品評乃至創作方向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遺文返質、崇尚古厚樸拙是當時書法審美的標準。道光年間的劉熙載(1813-1881)提出了與帖學傳統迥異的審美取向，將「金石氣」作為書法境界來標舉。㉔進入清代末期，碑學理論與碑派書法已深入人心。光緒十五年(1889)，康有為(1858-1927)的《廣藝舟雙楫》成書，除了建立系統化的書法理論體系外，書中進一步闡發包世臣(1775-1855)的書學理論，明確提出了「帖學」與「碑學」這兩個名詞來概括兩種截然不同的書學系統，並對取法歷代輾轉翻刻叢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㉓顧廷龍校閱，《藝風堂友朋書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頁1008。

㉔劉熙載，《游藝約言》。載崔爾平編，（明清書法論文選）（上海：上海書店，1994），頁888。

ｱiIfｻ･､､･indd　168　2005/12/5　､U､ﾈ 05:31:07

帖的帖學書風大加批評，㉕大力倡導碑版之美，有所謂「十美」之說，㉖建立了崇碑抑帖、尊魏卑唐的理論體系。

康有為堪稱碑學理論的集大成者。康氏的碑學思想，就歷史地位而言，確是打開了舊學問的一個缺口。但其對金石碑版的蒐藏不備，考據有欠周詳，使其持論難免有粗疏偏頗之處。晚年的康氏亦對這種思想作出修正，而崇碑抑帖、尊魏卑唐的思想已非康氏成為遺老後的堅持。㉗康有為本身的轉變正好說明了在碑學大潮下成長的遺老書法家在這方面的反思。

在澎湃的碑學風潮中首先作出反思，力倡碑帖並重者為活躍於道光年間的劉熙載。㉘劉氏以持平的態度看待碑、帖的價值，然而，「在涉及碑學和南、北宗問題的部分時，所使用的則是地道的碑學主張和書法史觀。」㉙故此，劉氏的主張與日後遺老書家所提倡的主張有觀念上的差異。

楊守敬深受當時書法潮流的影響，大量考察碑刻文字。尤其可貴的是，他能夠客觀持平地評價碑帖的優劣，不因重碑而排斥帖。楊氏的《激素飛清閣評碑記》、《激素飛清閣評帖記》成書於同治六年至七年(1867至1868)間，比康有為的《廣藝舟雙楫》早二十年。楊氏系統地評論從先秦到隋唐的碑帖，以具體的作品展示了千多年書法發展的軌跡，為後世建立書法發展史作了不可或缺的準備。㉚與《廣藝舟雙楫》相比，《評碑記》、《評帖記》態度顯得平實。楊氏認

㉕康有為批評帖學云：「今日所傳帖學，無論何家，無論何帖，大抵宋明人重勾屢翻之本。名雖羲獻，面目全非，精神尤不待論……國朝之帖學，薈萃於得天、石庵，然已遠遜明人，況其它乎！流敗既甚，師帖者絕不見工。物極必反，天理固然。道光之後，碑學中興，蓋事理推遷，不能自已也。」見康有為，《廣藝舟雙楫・原書》第二版(台灣：台灣商務印書館，1972)，頁6。

㉖康有為，《廣藝舟雙楫・十六宗》，頁67。

㉗由於康有為的《廣藝舟雙楫》成書於晚清年間，代表康氏的碑學思想體系，與康氏在民國以後主張碑帖融合之說有別，故文中不以《廣藝舟雙楫》的思想作為遺老書法家康有為的書學成就，只作為探索碑學發展背景的一部分。

㉘劉熙載《藝概・書概》：「北書以骨勝，南書以韻勝。然北自有北之韻，南自有南之骨也。」見金學智，《書概評注》(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1990)，頁124-125。

㉙劉恒，《中國書法史・清代卷》(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1999)，頁197。

㉚徐無聞、陳上岷，《關於楊守敬〈評碑記〉、〈評帖記〉》。載廖建明、陳慧編，《全國第四屆書學討論會論文集》(重慶：重慶出版社，1993)，頁196。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ｱiｴfｻ・、、・indd　169　2005/12/5　、U、ネ 05:31:07

為「集帖與碑碣，合之兩美，離之兩傷」，㉛二者缺一不可。在評碑中，楊氏固然很重視漢魏南北朝，但對唐碑的肯定也很充分。㉜楊氏看待碑帖的態度頗為通達，亦開風氣之先，惜楊氏早逝，限制了他在書學上的開拓。民國以後不僅考古出土蓬勃，尤其上古三代的新出土書法材料屢見，都是楊氏所未及見。如談到先秦碑刻，他只能舉出《石鼓文》，實際《石鼓文》以前的金石篆籀文字不知凡幾。㉝而且，他對於先秦古文字的價值尚有質疑，認為「三代古文尚矣，然高古絕倫變化無方，今不適用又不能盡識。」㉞這種取向，與民國之後，多見商周吉金，甚至甲骨文的遺老書法家，完全不可同日而語。故此，作為一個遺老書法家，楊守敬書學思想中雖有開新之處，然「舊」的成份仍然居多。

當然，不少遺老書家對清代碑學既有繼承，亦有反思。有清一代，於書論上力倡碑學者，莫如阮元(1764-1849)、包世臣、康有為之注目。阮元在碑學上強分「南北」，誠過於偏激，且早為大量溝通南北書風的新出土碑刻所推翻，故於晚清時期，其主張之影響力已見薄弱。相對而言，當時最受注視的是包世臣、康有為二家的碑學主張。包世臣對遺老書學觀點的啟迪，更毋庸置疑，如沈曾植曾於詩中自云：「包張傳法太平時」，㉟所指「包張」，乃是包世臣及《安吳論書》中提及與他切磋書藝的張琦(1764-1833)二人。㊱張琦無書論存世，然據《廣藝舟雙楫》所述，其觀點多與包世臣相合。沈氏自言受二人「傳法」，㊲可見影響非淺。另鄭孝胥(1860-1938)對包氏所倡技法亦加讚譽，認為「包氏所言學書之法，頗為切實」。㊳包氏的影響力，正如置身清末書壇的楊守敬總括：「所著《藝舟

㉛楊守敬，《激素飛清閣評帖記序》。見楊守敬著、陳上岷編，《楊守敬評碑評帖記》，頁95。

㉜徐無聞、陳上岷，《關於楊守敬〈評碑記〉、〈評帖記〉》。載廖建明、陳慧編，《全國第四屆書學討論會論文集》，頁196。

㉝羅繼祖，《墨佣小記》(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01)，頁102-103。

㉞楊守敬，《學書邇言》。崔爾平編：《歷代書法論文選續編》(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1993)，頁712-713。

㉟沈曾植，《趙森甫先德書冊》。見錢仲聯：《海日樓詩注》卷二(手稿)。

㊱見包世臣，《論書一・述書上》。《藝舟雙楫》第四版(台灣：台灣商務印書館，1986)，頁23。

㊲有關「包張」之身份，可參看拙著《沈曾植書法研究》(香港中文大學藝術學部哲學碩士論文，1997)。

㊳見鄭孝胥著、勞祖德編，《鄭孝胥日記》，頁1487。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ｱiIfｻ・、、・indd　170　2005/12/5　、U、ネ 05:31:08

雙楫》，遂以風靡天下。」㊴李瑞清不僅受包氏影響，對康有為《廣藝舟雙楫》亦頗關注，於《報陶心雲書》謂：

> 瑞清昔讀安吳《述書》，服其精思，但書體雜蕪，微乖大雅。南海康有爲作廣包書，搜集稍宏，但繹包說，匪繇思至。㊵

李瑞清對包、康的書學成就既有讚賞，亦有批評。其他遺老書家，對康氏書學亦有關注。當日鄭孝胥亦曾借閱《廣藝舟雙楫》，可反映康氏書學在遺老之間的流播。㊶民初之時，康氏又將已易名為《書鏡》的《廣藝舟雙楫》贈予海上遺老書家。㊷

然無論是包世臣，還是康有為的碑學理論，遺老多已持反思的態度。如鄭文焯(1856-1918)「深鄙包安吳之所謂北碑南帖者」，且主張「南碑逸逸深美之可貴」，㊸正是針對強分北碑南帖的主張而發。更多的乃是對包氏所推崇的鄧石如(1743-1805)在碑學上的成就作重新思考。鄧石如在篆隸方面的創造是由包世臣到康有為所一致推崇的，康氏更稱其「集隸書之成」。㊹鄭孝胥雖推舉包氏「所言學書之法」，但同時認為「包極推鄧石如，然鄧甚俗」，對鄧派書風持否定之態度。㊺趙熙(1867-1948)則對包世臣至康有為的碑學理論作出較客觀的評價：

> 晚清包慎伯談書，言其所得，其無所得而言，則所謂請對以臆也……南海書合冶包、張，其得失匪吾所及知……自阮文達後，徇俗競者以北魏殘石描摹於牙角間，吾閔其不知史中有《魏書》，誠亦輕薄魏收所不及料也。㊻

㊴楊守敬，《學書邇言・評書》。載崔爾平編，《歷代書法論文選續編》，頁743。

㊵李瑞清，《報陶心雲書》。《清道人遺集》(台北：文海出版社，1969)，頁62。

㊶鄭孝胥曾記載：「(1916年11月15日)從介庵借得《廣藝舟雙楫》。」見鄭孝胥著、勞祖德編，《鄭孝胥日記》，頁1634。

㊷如此書曾贈予鄭孝胥，鄭氏記載：「(1916年11月20日)康有為遺所著《書鏡》一冊，即《廣藝舟雙楫》改本。」見鄭孝胥著、勞祖德編，《鄭孝胥日記》，頁1634。

㊸詳見《鄭叔問先生尺牘》民國五年條・注。載戴正誠，《鄭叔問先生年譜》。北京圖書館編，《北京圖書館藏珍本年譜叢刊》(第184冊)(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9)，頁443-444。

㊹康有為，《廣藝舟雙楫・餘論》，頁76。

㊺見鄭孝胥著、勞祖德編，《鄭孝胥日記》，頁1487。

㊻趙熙，《康南海先生寄書方幅跋》。《趙熙集》(成都：巴蜀書社，1996)，頁1232-1233。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ｱiIfｻ・、、・indd　171　2005/12/5　、U、ネ 05:31:08

趙氏對碑學的矯枉過正作出反省，指出了時人不求考證研究，專「以北魏殘石描摹於牙角間」的失當。近人劉咸炘(1896-1932)在其書學論著《弄翰餘沈》亦對康氏《廣藝舟雙楫》中偏頗附會之說進行抨擊，然其提出主張之時應較活躍於民初的遺老書法家要遲。⑰

對碑學反思的態度，體現了由晚清到民初的書法發展已漸從自身演進中，產生了新的機運，這種新變有異於其他文學、藝術因深受西方衝擊而變化。因書法的發展有著其生態，它能透過自身體系的重組，蛻變出新的系統。清末民初的發展正顯現這種新趨向，其中尤以遺老書家沈曾植、鄭孝胥等反省最為徹底，重新審視帖學的價值，提出碑帖結合、南北並重的主張。而當接觸到大量新出土的書法材料時，他們遂以一種理性探索的角度，深厚的金石學基礎，為新時代的書學理論及書法創作寫上新的一頁。

四、新研究方法與新出土書法材料的啟示

1 新研究方法

晚清以來的重大考古發現，為民國前後的收藏界帶來極大的活力，同時亦促成了對書法史的研究，乃至方法學上的新思考。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不斷發現的甲骨文、漢晉簡牘、敦煌經卷、周原相繼出土的青銅器、洛陽的漢魏古墓群，還有清宮流出的歷代皇室寶藏，把民國時代的古物收藏推至高峰。這些器物品類繁多，年代之覆蓋面亦大，是古代書法家難以想見的。

王國維在《沈乙庵先生七十壽序》中指出清代三百年學術有三變：「國初之學大，乾、嘉之學精，道、咸以降之學新。」⑱ 遺老的學問正承接清道光、咸豐以降「新」的發展。形成「新」學問的背景，既有晚清公羊派基於「通變」

⑰劉咸炘生於1896年，民初時期年紀尚幼，不可能有《弄翰餘沈》之作。然劉氏卒於1932年，故該書可能撰於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書中批評康氏云：「康氏謂包氏以《受禪》、《尊號》分二派，統後世書，乃附會之談。然仍以鍾、衛為南北之宗，雖較可據，而仍不可泥定。蓋六朝承漢，漢碑自非鍾、衛所能統也。康氏《傳魏篇》，舉北朝諸碑及歐、褚、薛、柳、沈，一切牽歸衛派，謂其皆是北法，而上文又自言北亦有一人傳鍾法，誇大過甚，自相矛盾，莫甚於是。吾今所說，止取其類似，而不感強造統系。」見劉咸炘，《弄翰餘沈》。崔爾平編，《歷代書法論文選續編》，頁907。

⑱王國維，《王國維文集》（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1997），頁475。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ｱiIfｻ･､､･indd　172　2005/12/5　､U､ﾈ 05:31:08

的觀點，追求「微言大義」，[49]復有西學研究方法的滲透。其中沈曾植在治史地方面的成就已可見一斑，他畢生學問所研不外求「通」，而創作則求其「變」。沈曾植在西北地理的研究已表現了融通的思考模式。晚年進一步接受新學術方向的影響，惜著作已不多，據其自述原因謂「著述久已絕念，舊稿發端在東西學者之前成，問世已落東西學者之後。」[50] 亦見其對西方學術研究的注意，從而產生自省的作用。王國維更表現了對西方史地、文學、哲學、倫理學、心理學的多角度借鑒。他們體會到學風之變，對晚清以來的學問作出了「新」與「變」。除學術觀點與治學方法上，學科亦得以更新。[51] 余英時認為這個「新」即是「變異愈來愈多，典範已不得不時加調整」，如西北史地之學是清代後期一門新興的學科。[52]這時候之所以有這麼多的新興學科崛起，特別是西北史地之學的興起，原因是多種多樣的。當然，主要的是西北地區新材料的屢屢出現，令學者的視野逐漸擴大。

金石學雖然古已有之，此時更為繁榮，也可說是屬於新興學科。[53] 金石學及考古學的革新，乃基於新材料發現的結果，王國維《近三十年中國學問上之新發現》曾說：

> 古來新學問之起，大都由於新發見之賜。有孔子壁中書之發見，而後有漢以來古文家之學。有趙宋時古器之出土，而後有宋以來古器物古文字之學……然則中國書本上之學問，有賴於地底之發見者，固不自今日始也。[54]

王國維的一段論述，明言了這種新學術的興起，源於新的出土發現，亦顯示新的

---

[49]晚清公羊學派以莊存與、張惠言、劉逢祿、宋翔鳳等為代表，李兆洛、龔自珍等亦倡導之，清末廖平、康有為的著作仍體現這種學術路向。

[50]見《沈乙盦尚書手簡》影印本。另見管野智明，《羅振玉舊藏「沈乙盦尚書手簡」初探》第二札(民國二年二月十七日)。《福島大學教育學部論集》第63號，1997年12月，頁4。

[51]詳見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香港：中華書局，1963)一書。

[52]詳見余英時，《中國哲學大綱與史學革命》。《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適》附錄一(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頁84。

[53]陳燕，《清末民初的文學思潮》(台北：華正出版社，1993)，頁160。

[54]王國維講、方壯猷記注，《近三十年中國學問上之新發現》。《女師大學術季刊》，第1卷第4期，附錄一。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ｱiｴfｻ･､､･indd　173　2005/12/5　､U､ﾈ 05:31:09

方法學帶來的新視野。所謂新方法學就是以出土文物代替純文獻的考據。[55] 王國維把「新發現」歸納為五類：一、殷墟甲骨；二、漢晉木簡；三、敦煌寫經；四、內閣檔案；五、外族文字。[56] 王國維從古來新學問的興起都與新事物的發現聯想到這些新事物主要為出土之物，從而剖析中國學術的發展多裨益於發掘之古物。反映了在王國維的時代，一方面對新出土的器物極之關注；另一方面顯示了知識份子對崇古和傳統有了新的詮釋。他們對歷史的尊重和借古以求新的思想不變，但「古」的對象，已由單純的古書(文獻資料)轉入了以出土文物為基礎的新學；「古」的範圍也更為深遠遼闊。正因如此，也促成了以分類、斷代等更精密的方法研究這些文物。亦由於史學觀點的革新，引發了其他學問領域的同步更新。王國維在《國學叢刊序》中說：

> 今之言學者，有新舊之爭，有中西之爭，有有用之學與無用之學之爭。余正告天下曰：學無新舊也，無中西也，無有用無用也。[57]

這便是王氏的「學術三無」說。王國維的思想，在當時而然，頗具劃時代精神，因其對學問的看法是相互融通，無論新與舊、中與西，根本沒有分別。

羅振玉亦擁有宏觀的歷史視野，對古代文物系統化的收藏整理，實非傳統以來「玩古」的心態。在史學方法上，已初具現代考古學的規模。正如他深感近世各種文物出土大增，「金石學」這一用語已不能概括當時的研究對象。因為清代金石學初以金石文字的考訂為主，範圍較狹，其後學者開始注意到青銅器和金石文字以外的古器物。因此，羅氏在《與友人論古器物書》一文中提出用「古器物學」的名稱，以擴大文物的保護和研究領域。[58] 他還在文章中提出把文物分為「十五目」，而振興該學科的當務之急是先抓流傳一環節，有四方面的工作：一、鑒定傳世古物真偽；二、傳拓文字、摹拓器形；三、製作古器物標本；四、

---

[55] 季羨林，《饒宗頤史學論著選序》。《饒宗頤史學論著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頁7-8。

[56] 同上，頁8。

[57] 王國維，《國學叢刊序》。《王國維文集》，頁413。

[58] 1919年，北大校長蔡元培邀請羅氏任職北大講授考古學，並詢問這一領域開拓事宜。羅氏答書數千言，一面辭謝其邀請，一面就中國金石學之源流、發展方向、研究方法等提出自己的看法和建議。又以《古器物研究議》為名，發表了答蔡元培書的主要部分。次年將此文收入《雲窗漫稿》，易名為《與友人論古器物書》。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ｱiIfｻ･､､･indd　174　2005/12/5　､U､ﾈ 05:31:09

撰述、編輯名物圖考。[59] 羅氏的研究方法切實可行，而所標舉的十五門類，基本囊括了考古學研究對象中的大部分範圍，並已被廣泛應用於現代考古學和博物館。正如郭沫若(1892-1978)對羅氏在這方面的評價：

> 羅氏在中國要算是近世考古一位先驅者，他的搜藏與從來古董家的習尚稍有區別，他不僅搜集有文字的骨片，並還注意到去搜集與骨片同時出土的各種器物；在1916年他還親自到安陽小屯去探訪過一次。這種熱心，這種識見，可以說是從來的考古家所未有的。[60]

此外，羅氏與康有為皆有倡設博物院之議，[61] 這些主張都建基於外來觀念的衝擊。由此可見，他們對整理金石收藏，乃至考古發現的思想，已不拘於乾嘉學者的範疇。

究言之，清代後期的社會政治、經濟形勢發生重大轉變，在學術界，乾、嘉考據學派影響消退，偏重於經世致用的今文經學勢力逐步擴大。由金石學的鼎盛，啟示了其他學科的研究，碑學是其中之一，史學也是其一。[62] 不過，在變革和更新之際，這群知識分子在精神和思想深層沒有離棄傳統學問；但就實用方法而言，卻必須接受新方法，也可以此說明如沈曾植、王國維一輩的學者的共同心態。在此並反映了在遺老書法家之中，亦有能於古今中西學問之間創格出新的人物。可見遺老在政治上未能進步，卻不代表他們在學術上保守；反之，在學問的天地當中，他們擁有相對宏博的視野。

2 新出土書法材料的視野

晚清以來，波瀾壯闊的新出土文物，如河南安陽殷墟甲骨的發現，漢晉簡牘的出土，敦煌莫高窟藏經洞的豁然開啟，幾乎無法統計的浩瀚文物，為考古學者和收藏家帶來了機遇。新出土不但體現了考古學及收藏上的空前成就，對於近現

---

[59] 羅琨、張永山，《羅振玉評傳》(國學大師叢書)(南昌市：百花洲文藝出版社)，頁89-90。

[60] 郭沫若，《卜辭中的古代社會・序說》。見《中國古代社會研究》(香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78)。

[61] 有關康有為倡設博物館之議，可參看康同璟：《七女同璟跋》。見李雲光編，《南海康先生法書》。至於羅振玉倡設博物館一事，可參看王慶祥、蕭立文校注，《羅振玉王國維往來書信》(1922年7月26日)，頁541。

[62] 劉恒，《中國書法史・清代卷》，頁234。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ｱiIfｻ・、、・indd　175　2005/12/5　、U、ネ 05:31:10

代美術乃至美術史的研究亦影響巨大，[63]亦同時指引了書學研究及書法創作的新方向。[64]書學與其他學問一樣，面對這些光芒奪目、浩瀚無際的新出土材料，不能不對書法家的思想構成衝擊。而這些新學問、新書風在遺老圈子發生而非其他文化圈子，便說明了這些新材料背後所牽涉的深博傳統學問根基。就如古文字的研究，若沒文字學(小學)、訓詁學和歷史的深邃知識基礎，空得其物亦是束手無策。而在民國時代，擁有深湛傳統學問根柢者，莫如這群遺老。且由於遺老們自成一體的圈子，使其思想得以在自身的文化圈子內擴展，也促成了新出土書法材料在遺老書法家、金石家群中競相傳習。遺老如羅振玉、王國維更是這些新出土書法材料的整理與流播的關鍵人物。羅振玉更自覺其中的成就遠超前人，在致王國維書信中曾謂：

> 自問平生文字之福，遠過前人，殷虛文字一也，西陲簡冊二也，石室遺書三也，大庫史料四也…… [65]

相對於前人稱頌有加的乾嘉諸老，羅氏亦認為有過之而無不及：

> 予平生所至輒窮，而文字之福則有，非乾嘉諸儒所及者。由庚子至辛亥十餘年間，海內古書器日出。若洹濱之甲骨，西陲之簡牘書卷，中州之明器，皆前人所未及見者。[66]

羅氏闡釋新出土的豐碩成果固然與「地不愛寶」的因緣際會有一定關係，他更將之歸功於「刊述流傳，得書至便」；「聲氣相應，梯航大通」；「觀摩逮於殊方，交友極於天下」這些環境因素。[67]新書法材料之出土本始於清朝末年，惟當時

---

[63] 見王遜，《出土古文物與美術史的研究》。《美術》，1954年7月，頁38-41。

[64] 有關新出土書法對二十世紀書學研究(尤其書法史)的影響，可參看陳振濂，《近百年出土書蹟對書法史的影響》。載中華書道編輯委員會編，《出土文物與書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北：中華書道學會，1999)，頁拾1-16。至於論述新出土材料對二十世紀書法之影響的論文甚多，較具代表性者可參看白謙慎，《二十世紀的考古發現和書法》一文。載國立歷史博物館編輯委員會，《1901-2000中華文化百年論文集》(台北：國立歷史博物館，1999)，頁238-271。

[65] 王慶祥、蕭立文校注，《羅振玉王國維往來書信》(1922年4月27日)，頁530。

[66] 羅振玉，《集蓼編》。《雪堂自述》，頁42。

[67] 羅振玉，《國學叢刊》序。同上，頁13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ｱiIｴｻ・、、・indd　176　2005/12/5　、U、ネ 05:31:10

研究未具規模，對書法藝術更未見影響。大規模整理研究當在民國年間才正式展開，且得以引入書法創作之中。當中的發展歷程更與遺老圈子密切相關，此亦羅振玉強調新出土與人為環境因素關係尤大之故。

過去不少學者認為當時書法家並沒有敏銳地觀察到這些新材料在書法上的價值，也沒有及時融入書法創作之中，[68]這實是不符合歷史的言論。沒有遺老書家的致力提倡，國人或根本不知這些出土文物之重要性；沒有他們的開拓，也未必有後來的發展。

i）甲骨文

清末首項重要考古發現是甲骨文。眾所周知，光緒二十五年(1899)王懿榮(1845-1900)發現甲骨文。王氏作為最早認識和收藏甲骨的人物，共收集甲骨一千多片。但王氏在發現甲骨文翌年即自殺身亡，故對甲骨文未有進行深入研究。其後，所藏甲骨為劉鶚(1857-1909)購得；加上自己原藏部分，劉氏擁有之甲骨多達五千餘片。羅振玉與劉鶚相交甚深，光緒二十年(1894)已在劉家當塾師，後更成為兒女親家，可見羅振玉對劉鶚所藏甲骨加以考證實早有淵源。當羅振玉在劉鶚處得見甲骨文後，力勸劉氏編印《鐵雲藏龜》。光緒二十九年(1903)，劉氏遂選拓一千多片，編成《鐵雲藏龜》刊行於世，這是甲骨文第一次被著錄印行。《鐵雲藏龜》由羅振玉親自作序，序中對這種書體加以考據，並推測其時代及出土地點：

> 其文字之締造與篆書大異，其爲史籀以前之古文無疑，爲此龜與骨乃夏商而非周之確證，且證之經史亦有定其爲夏商而非周者。因出土所見尚少，且出土地址未詳，尚不能斷定爲殷墟之物耳。[69]

後劉鶚客死新疆，甲骨文的研究，羅氏成了主帥。其實，早於光緒三十二年

---

[68]過去持此論點之學者不少，直至近期出版的書法論著猶是如此，如黃惇在《當代中國書壇格局的形成與由來》說：「甲骨、漢晉簡牘殘紙、敦煌寫經，均於本世紀初開始被發現，但當時的書家卻鮮有問津者，其原因或為康、吳等人的書法籠罩，或言書家之宗旨以摹古為主，對接受新鮮事物麻木不仁……當然這一時期缺乏敏銳的理論家也是造成這一現象的原因之一。只有羅振玉(1866-1940)在研究甲骨文的同時，開始以甲骨文為素材進行創作，其他出土書跡幾乎在當時書家的筆下沒有反映。」該文見中國書法家協會研究部，《全國第五屆書學討論會論文集》(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頁57。

[69]羅振玉，《鐵雲藏龜》序。見劉鶚，《鐵雲藏龜》(台北：藝文印書館，1959)。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ｱiｴfｻ･､､･indd　177　2005/12/5　､U､ﾈ 05:31:10

(1906)到清廷學部任職後，羅氏便注意搜集甲骨，宣統元年(1909)起委託琉璃廠商人及其弟羅振常(1875-1942)，四次赴河南收購甲骨，先後得二萬餘片。經多方搜羅，共收甲骨三萬片以上，奠定日後研究之基礎。

而真正跨越甲骨文研究重要關口的是進行釋讀的工作，開拓之功首推孫詒讓和羅振玉。孫氏曾據《鐵雲藏龜》之資料，撰成《契文舉要》和《名原》，對商代歷史和甲骨文字進行考釋。然孫氏之考釋只有創始之功，實未成體系，真正之完成者有待羅振玉。正如郭沫若認為：「甲骨文自出土後，其搜集、保存、傳播之功，羅氏當據第一，而考釋之功亦深賴羅氏。」⑦⓪他編輯並印行了《殷虛書契》前編、後編、續編及《鐵雲藏龜之餘》、《殷虛書契精華》、《殷虛古器物圖錄》等重要圖錄，為甲骨文的拓印和流傳作出了巨大貢獻。他在甲骨學研究中最重要的成就是利用大量甲骨文資料，考證出安陽即是商代後期的都城所在地。1928年河南安陽殷墟遺址的發現，成為二十世紀中國考古的最重要發現之一，羅氏的考證功不可沒。

從今天的角度來看，甲骨文的出土無疑是考古界的重大事件。然實際上，初期所引起的注視程度，又並非今天想像般理所當然。當羅振玉於劉鶚所藏中首見甲骨文字墨本，並驚嘆：

> 此刻辭中文字，與傳世古文或異，固漢以來小學家若張、杜、楊、許諸儒所不得見者也！今幸山川效靈，三千年而一泄其秘，且適當我之生。⑦①

然數年間仍迴響杳然，只有孫詒讓曾作個別考釋。⑦②直至《殷虛書契前編》出版之年，甲骨文出土已逾十年，羅氏猶不禁慨嘆：

> 寶物之幸存者有盡，又骨甲古脆，文字易滅，今出世逾十年，世人尚未知貴重，不汲汲搜求，則出土之日即澌滅之期。⑦③

羅氏只有慨然自任，深感「則所以謀流傳而攸遠之者，其我之責也夫！」⑦④羅

⑦⓪郭沫若，《中國古代社會研究》，頁170。

⑦①羅振玉，《殷虛書契前編》序。《雪堂自述》，頁125。

⑦②羅振玉《殷虛書契前編》序謂：「顧先後數年間，僅孫仲容徵君〔詒讓〕作《契文舉例》，此外無聞焉。」所見同上，頁125。

⑦③羅振玉，《殷虛書契前編》序。同上，頁125。

⑦④同上。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ｱiｴfｻ･､､･indd　178　2005/12/5　､U､ﾈ 05:31:11

氏於民國五年(1916)出版的《殷虛書契後編》序中猶稱甲骨學為「寂寞之學」，[75]可見當時一般人仍知之甚少，收藏者尚屬少數，研究者更是幾希。一直與羅振玉堅定不移地鑽研此「寂寞之學」的當然是其學術摯友王國維。羅氏在甲骨搜集及流傳上功勞至大，至於考釋甲骨文字，羅、王二人皆居功至偉。而進一步以甲骨文字考證古史，凸顯甲骨文這新材料在古史研究上的地位則非王國維莫屬。可以說，王氏對甲骨文字研究的貢獻，不在甲骨文字的本身，而是由甲骨文字而起的考古及歷史研究成果。[76]

民國年間，甲骨的收藏以羅振玉、劉體智和加拿大傳教士明義士(James Mellon Menzies, 1885-1957)為三大宗。羅振玉乃不折不扣的遺老；劉體智雖無自稱遺老，然與上海遺老關係密切，其兄劉體乾(1879前-？)則為遺老中人。劉體智藏甲骨達二萬八千之數，小部分來自遺老金石家徐乃昌(1868-1936)，1937年由日本文求堂出版《善齋藏契萃編》。他於研究甲骨文雖無重大開拓，但有收藏之功，更裨益學者，其甲骨藏品後由郭沫若編輯並考釋成《殷契萃編》。其他遺老雖然並無羅、王般專研甲骨，然在密切交往中，既得知甲骨之出土，復肯定甲骨之意義重大，更獲悉甲骨文之考證進程。羅、王二人透過書信，不斷把消息於遺老圈中傳播。

當羅氏於民國三年(1914)出版《殷虛書契考釋》之時，曾迅速告知沈曾植，沈氏亦大為讚賞，對王國維所撰序言尤為欣賞。[77]羅氏甲骨著作出版後，上海遺老得知最早，反應亦最熱烈。沈曾植民國二年(1913)秋致書羅氏：

> 《書契後編》，於吾國文明史上，發一殊采，然思快覩，不知出書時，能見示一部否。此書信受奉行，決不在現在吾國之儒流，而在他日異邦之學者，可斷言之，鄙雖未窺一斑，然固懸知公之疏通知遠，足以質鬼神，而俟後聖也。[78]

對收藏甲骨同樣深具興趣的遺老徐乃昌致書繆荃孫時談及：「叔蘊先生新印《殷虛書契》極精，容紹介友人得之。」[79]據羅振玉自述，王秉恩(1845-1928)「春間聞予《殷虛書契考釋》成，乃亟訪予弟子敬購求之，謂予所著書，其行篋中無不

[75]同上，頁126。

[76]王毅德，《王國維先生的學術貢獻》。《書和人》第41期，1966年9月，頁381。

[77]王慶祥、蕭立文校注，《羅振玉王國維往來書信》(1914年3月27日)，頁12。

[78]沈曾植，《沈曾植致羅振玉書》第三札(民國二年秋)。菅野智明，《羅振玉舊藏「沈乙盦尚書手簡」初探》。《福島大學教育學部論集》第63號，1997年12月，頁4。

[79]顧廷龍校閱，《藝風堂友朋書札》，頁744。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ｱiIfｻ･､､･indd　179　2005/12/5　､U､ﾈ 05:31:12

備。」⑧⓪可見不少上海遺老亦開始對甲骨加以關注，並有復加收藏者，如上文提及的徐乃昌自述「敝處藏書契甚夥」，⑧① 或許徐氏研究甲骨亦非一朝一夕之事。此外，沈曾植亦藏有甲骨，致信羅振玉時謂：

> 甲骨皆有之，無人能拓，遂多年未啟視，此事遂讓公先鞭，讀公書欽且妬也。⑧②

至於鄭孝胥，未見記載其可有甲骨之收藏，但曾記述觀賞甲骨於他人寓所之中：

> 黃秀伯約過其寓，觀魯正叔銅琴及龜版文，殷契拓本…… ⑧③

要言之，羅振玉早期對甲骨文的收藏研究，多從歷史考古及文字發展角度，正如其自謂「此書最有裨於考古」，⑧④罕及書法上的探究。據現存資料，最早把甲骨文置於書法發展史上作討論的是李瑞清。李氏非常推崇殷墟文字，認為從前出土的殷文字，只是從殷器中偶而可見一二象形文字，不可稱其為派。然出土的殷墟龜版、牛骨文字雖不全，但可看出代表一代文字的風尚，故可別為一派：

> 近出龜版牛骨，實爲殷虛文字，至可寶貴。睹之，其派最爲明顯。從前殷代文字但於殷器中見一二象形字，不足成立，今殷虛之龜版牛骨，其文字雖不全，可以灼然知其一代文字之派矣。想其他種尚多，後世當有續出者，以待後人之考訂可也。余則暫定龜版爲殷派，周則暫以器分派也。⑧⑤

李瑞清將龜版、牛骨劃分為「殷派」，其支派為《陳曼簋》、《居彝》、《拍盤》。他認為此派傳至秦，李斯繼承了其風神，「秦承周後，反周之文從殷之質，

---

⑧⓪羅振玉，《五十日夢痕錄》。《雪堂自述》，頁115。

⑧①顧廷龍校閱，《藝風堂友朋書札》，頁744。

⑧②沈曾植：《沈曾植致羅振玉書》第一札（宣統二年十二月初九）。見菅野智明，《羅振玉舊藏「沈乙盦尚書手簡」初探》。《福島大學教育學部論集》第63號，1997年12月，頁3。

⑧③鄭孝胥著、勞祖德編，《鄭孝胥日記》（1913年6月9日），頁1466。

⑧④羅振玉，《集蓼編》。《雪堂自述》，頁42。

⑧⑤李瑞清，《玉梅花盦書斷》。崔爾平編，《明清書法論文選》，頁1098。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ｱiIfｻ･､､･indd　180　2005/12/5　､U､ﾈ 05:31:12

故文字亦相師也。貨幣文亦多師此。」[86]可見他已把甲骨文納入書法史的發展體系，由此建立了古代書法發展的源頭。李瑞清在《跋自臨禮器碑》謂：

> 余於漢碑中獨喜《禮器》……其書則上承殷龜版文，下開《啓法》、《龍藏》二碑，河南《聖教》是其適嗣，北海《李思訓》實用其法。[87]

在審視後世書法發展時，李瑞清回顧了其與甲骨文的發展淵源。無論甲骨文與《禮器碑》在風格上是否真正有承傳關係，但已開啟了以甲骨文論述書法發展的新路向。李瑞清把甲骨文定為「殷派」，作為書法史之開端。日後羅振玉開以甲骨作書之風，羅氏與章鈺(1864-1937)、葉爾愷(1864-1937前)等分別以甲骨文字集為楹聯，其發展都在遺老金石及書法家中展開。

雖在時日推移之中，甲骨文乃至其書法價值漸漸受到世人重視，然作為開創先河的關鍵人物，部分遺老所投入的無比熱誠和毅力實難以抹煞。他們透過研究和實踐把甲骨文字的光輝重現，使之成為直至今天猶為中國書法史的起點。

ii) 漢晉簡牘

漢晉簡牘的發現和研究的開展，更能表現遺老對新出土書法材料的運用。相對於甲骨文，漢晉簡牘在解讀上更容易，且最重要為古代墨跡，因此，對書法所產生的影響，便來得更大和更直接。

自瑞典人斯文赫定(Sven Anders Hedin, 1865-1952)於光緒二十六、二十七年(1900-1901)在新疆古樓蘭遺址獲得漢簡一百二十枚後，歐西學者接踵而至。光緒三十三年(1907)，匈牙利人斯坦因(Aurel Stein, 1862-1943)於敦煌西北古長城廢墟發現大批漢簡，約近千枚。羅振玉在光緒三十四年(1908)得知其事，然未得見其貌。後聞已交法人沙畹(Emmannd-Edouard Chavannes, 1865-1918)負責考釋，乃致書求問，但輾轉多時，羅、王得見出土簡牘已在癸丑歲暮(約1913年底)二人寓居日本之時。在沙畹提供簡牘圖片之下，二人迅速整理，並加以考釋，短期之內編成《流沙墜簡》一書。

從羅、王整理墜簡之方向，反映二人對簡牘價值的認識。《流沙墜簡》一書共分三大類：一為小學、方技、術數書，二為西域屯戍叢殘，三為簡牘遺文，[88]完全依照簡牘內容分類。民國三年(1914)王國維在給繆荃孫的信亦肯定這

臺灣學術期刊資料庫

[86] 同上，頁1098。

[87] 李瑞清，《跋自臨禮器碑》。所見同上。

[88] 王慶祥、蕭立文校注，《羅振玉王國維往來書信》(1913年末至1914年初)，頁9。

ｱiｴfｻ･､､･indd　181　2005/12/5　､U､ﾈ 05:31:12

批文物在學術上之價值：

> 歲首與蘊公〔羅振玉〕同考釋《流沙墜簡》……考釋雖草草其稿，自謂於地理上裨益最多，其餘關乎制度名物者亦頗有創獲。⑧⑨

此書出版，固然對學術界引起極大震撼。羅振玉在信中告知王國維其他人的讚許之言：

> 大作《流沙墜簡序》拜服者尚多。《考釋》書必爲購書者所歡迎也。⑨⓪

不單國內如此，該書在日本東京亦甚為暢銷，⑨①可說為中外所重。即如推動「新文學」者如魯迅(1881-1936)亦予高度評價，然著眼點仍是其「國學」成就：

> 中國有一部《流沙墜簡》，印了將有十年了。要談國學，那才可以算一種研究國學的書。開首有一篇長序，是王國維先生做的，要談國學，他才可以算一個研究國學的人物。⑨②

正由於許多人皆著意於該書的學術乃至史料價值，致使過去不少學者忽略了當時已有書法家注意到簡牘的書法價值。其時，這批出土漢簡於書法上所產生的迴響，也是在遺老圈中開展的。羅振玉在該書刊行之前，早已將流沙墜簡的發現及研究情況去信告知上海遺老友好繆荃孫、沈曾植等。在致繆荃孫信中云：

> 近撰定《流沙墜簡》，乃英人司坦因博士所得敦煌古木簡，爲西漢訖魏晉遺物，皆分書及章草墨跡，現分爲三書…… ⑨③

對於一個擁有敏銳觸覺的書法家來說，漢、晉簡牘的出土，使他們親眼看見當時的書法真跡，是何等的震撼！然繆荃孫並無意書法，此時的羅振玉亦未專意其事，王國維更不消說，他們深深著迷的依然是其中包含的古史地學材料，的確未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⑧⑨吳澤主編，《王國維全集・書信集》(1914年7月17日)(北京：中華書局，1984)，頁40。

⑨⓪王慶祥、蕭立文校注，《羅振玉王國維往來書信》(1914年3月29日)，頁14。

⑨①顧廷龍校閱，《藝風堂友朋書札》(羅振玉致繆荃孫書)，頁1011。

⑨②魯迅，《且介亭雜文》二集(香港：香港今代圖書公司，1964)。

⑨③顧廷龍校閱，《藝風堂友朋書札》，頁1013。

ｱiIfｻ・、、・indd　182　2005/12/5　、U、ネ 05:31:13

引起他們對簡牘書法的深入鑽研，但已注意到簡牘包含「分書及章草墨跡」的豐富書法素材。

深感簡牘書法震撼之力的是當時致力於書法路向探索的沈曾植。沈氏在民國二年(1913)底獲得羅振玉提供的墜簡材料，回信時表現殷切期待，並就書法史角度加以論述：

> 漢竹簡書，似唐人。鄙向日論南北書派，早有此疑，今得確證，助我張目。前屬子敬代達攝影之議，不知需價若干，能先照示數種否，此爲書法之計，但得其大小、肥瘦、楷書數種足矣，亦不在多也……
>
> ……今日得正月廿七日書，并「流沙墜簡」樣張，展視煥然，乃與平生據石刻金文，懸擬夢想儀型不異。用此知古今不隔，神理常存。省覽徘徊，頓復使滅定枯禪，復及數旬生意……墜簡中不知有章草否，有今隸否，續有印出，仍望再示數紙，餘年無幾，先覩之願，又非尋常也。㊹

上述兩段引文出自沈氏致羅振玉的一封信，分別寫於民國二年(1913)底及民國三年(1914)二月三日。在民國二年底所寫的部分，沈曾植開宗明義指出簡牘之價值在「書法之計」，希望羅氏提供「大小、肥瘦、楷書數種」不同字樣的簡牘。在另一部分，則查詢「墜簡中不知有章草否，有今隸否」，顯示他已注意到簡牘中存在著多元化書體的面貌。正如葉恭綽(1881-1968)在《漢晉西陲木簡彙編・序》總結簡牘書體的特質時說：

> 我國篆、隸、八分、章草、草、隸、楷之蛻嬗，及其詳細區別，曩者往往累萬言不能推證，以無眞跡可據也。今此編諸體俱備，依以墾闡，可一掃捫籥之談。㊺

大量墜簡墨跡，包括了隸書、章草、行書、草書等書體，且能清楚反映書體嬗變之淵源關係，難怪沈氏看到「流沙墜簡」樣張時，感動地說：「乃與平生據石刻金文，懸擬夢想儀型不異。」而得見墜簡，不單可與「石刻金文」書法兩相對照，更進一步推衍其書學理論的發展，肯定過去對南北書派的推論，故認為漢簡

㊹沈曾植，《沈曾植致羅振玉書》第四札(民國二年・歲暮——民國三年・新春二月三日)。載菅野智明，《羅振玉舊藏「沈乙盦尚書手簡」初探》，《福島大學教育學部論集》第63號，1997年12月，頁5。

㊺葉恭綽，《漢晉西陲木簡彙編・序》。見張鳳：《漢晉西陲木簡彙編》(上海：有正書局，約1931)一書。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ｱiIfｻ・、、・indd　183　2005/12/5　、U、ネ 05:31:13

實有「助我張目」之作用。

此後，沈氏常於書論中提及墜簡書法。他認為墜簡中部分書法與某些漢碑同出一源，特別標舉「始建國」(圖1)、「折傷薄」(圖2)、「急就篇」數簡，認為與《禮器碑》「細勁」之風近似：

> 《禮器》細勁，在漢碑中自成一格。或疑師宜官書，雖無確證，然非中郎派，可決定也……《流沙木簡》中「始建國」、「折傷薄」、「急就篇」，皆此體。⑯

沈氏還把墜簡求證於存世墨跡：

> 內府收王珣《伯遠帖》墨跡，隸筆分情，劇可與流沙簡書相證發，特南渡名家，韻度自異耳……味此數語，以觀今跡，覺於南北合離，極有會處。⑰

《伯遠帖》為現存最早書法墨跡名作，出於東晉南渡名家王珣(350-401)之手，沈氏認為正好與出於西北地區的流沙墜簡墨跡互相印證，證明南北書風之「隸筆分情」皆有互通之處。故此，他引《述書賦》「南北合離，極有會處」之語，說明南北書風會通之處。

受到出土簡牘之啟發，沈氏又嘗試構建南北朝書法的發展概況，他最關注的仍是書體問題：

> 南朝書習，可分三體。寫書爲一體，碑碣爲一體，簡牘爲一體……碑碣南北大同，大較於楷法中猶時沿隸法。簡牘爲行草之宗，然行草用於寫書與用於簡牘者，亦自成兩體。《急就》爲寫書體，行法整齊…… ⑱
>
> 書家以簡牘、碑板爲二體，碑板之盛，大抵在永初以後，亦不能甚先於尺牘也。⑲

沈氏指出了流行於南朝的三種書體：「寫書」、「碑碣」、「簡牘」，更說明彼此之關係，以及「南北大同」與同中有異的問題，又據出土資料推斷書體的流行時期。礙於資料不足，這種分析雖然未具系統，但已顯現了沈氏欲初步構建南北朝書法的發展概況，以及書體承傳淵源的企望。

---

⑯沈曾植，《禮器碑跋》。載沈曾植，《海日樓札叢》（上海：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1962），頁318-319。

⑰沈曾植，《海日樓札叢》卷八，頁310。

⑱同上。

⑲同上，頁318。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ｱiIfｻ･､､･indd　184　2005/12/5　､U､ﾈ 05:31:13

沈氏對流沙墜簡的書法欣賞有加，認為墜簡中的「波磔」用筆於書體衍變中的意義尤為「可貴」，嘗言：

> 黃論閣帖，眞碻有據依，非僅精識。以波磔別章草，可謂得立論之源。漢晉以下，波磔寖少，或非天然矣。流沙墜簡，所以可貴。(100)

沈氏覺得漢、晉以後書法「波磔寖少」，而墜簡墨跡卻能重見「波磔」特徵，與同期章草用筆實有異曲同工之妙。「波磔」用筆源出隸書，至章草猶存，與漢隸可謂一脈相承。沈氏進而提倡學習簡牘書法，並去信教授弟子習簡牘之法，《與謝復園書》謂：「流沙墜簡，試懸臂放大書之，取其意而不拘形似，或當有合。」(101)說明了他對漢簡筆法的摻用，是其筆意而非形貌。

沈曾植從古代碑刻與墨跡中尋找墜簡在書法史上的定位，而鄭文焯則從古代書論及記載中探索箇中問題。鄭氏應亦由羅、王編著的《流沙墜簡》得見古代書法墨跡，因鄭氏曾記述：

> 此見上虞羅叔蘊珂羅版精印敦煌古簡一冊，審爲漢代墨跡，有龍蛇迤邐之勢，庾肩吾書品敘所謂削簡傳令，則萬里對面，攬之者能無心戰色沮，想其時冰天雪窟中，磨盾疾書之概，漢簡眞傳，信而有證，蔡中郎所稱草篆者，此其類歟，簡書間有紀元歲月，彌可寶貴。(102)

鄭氏除以「龍蛇迤邐之勢」力讚墜簡書法外，更求證於古人書論。引庾肩吾(487-551)《書品敘》所謂「削簡傳令」，說明墜簡之來歷；又推斷墜簡可能就是蔡邕(133-192)書論中提及的「草篆」一類。而墜簡出土，信而有徵，加以有年月可考，就更能結合古代書史及書論記載相互印證。鄭氏更強調墜簡之所以彌足珍貴實與禁碑之舉有關：

> 而裴松之上表禁斷碑銘，寄奴一朝其片石鐫勒，嗜古者輒閟爲奇寶，況簡書筆跡朗然如新，信足與永初章草，並爲千百年秘文神品，世上那得復覩耶。兩漢

(100)沈曾植，《海日樓書法答問・辛酉九月十七日答松生問》。《同聲月刊》第3卷第11號，1944年4月，頁115。

(101)同上，頁114。

(102)鄭文焯，《古簡攷》。見弓野隆之，《鄭文焯論書攷》。《中國近現代文化研究》第1號，1998年12月，頁25。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ｱiIfｻ・、、・indd　185　2005/12/5　、U、ネ 05:31:14

南北朝墨蹟傳世，唯此足徵，記之以識古簡之一格云。[103]

裴松之(372-451)上表禁碑之後，碑刻流傳甚少，何況「簡書筆跡朗然如新」，故此，更彌足珍貴。由出土漢簡而起，引發鄭氏進一步尋本探源，回溯了簡牘的歷史片段。

另一位深深感受到墜簡出土對書法界的震撼力乃遺老書家鄭孝胥。他接觸墜簡可能比沈曾植略遲(約1915年)，但亦早已風聞其出土。《流沙墜簡》一書出版後，鄭氏以先睹為快，乃向友人借閱：

楊壽彤來談，以《流沙墜簡》及宋仲溫《書譜》借余觀之。[104]

民國五年(1916)春，羅振玉由日回滬，攜備《流沙墜簡》贈予上海遺老友好，鄭氏亦獲饋贈，日記中有載：

赴丁衡甫午飯，叔蘊贈《流沙墜簡》三冊。[105]

鄭氏從書法史的角度審視《流沙墜簡》的價值，他於《題莊蘩詩書陶詩序》云：

自《流沙墜簡》出，書法之秘盡泄，使有人發明標舉，俾學者皆可循之以得其徑轍，則書學之復古，可操券而待也。其文隸最多，楷次之，草又次之，然細勘之，楷即隸也，草亦隸也……然則不能隸書者，其楷、其草理不能工，試證之《流沙墜簡》而可見矣。[106]

一句「書法之秘盡泄」道盡了「流沙墜簡」在書法史上的意義。鄭氏從學習書法的實際角度出發，認為可將墜簡書法加以學習發揮，「則書學之復古，可操券而待也」，說明了他以古代筆法尋求創新的傾向。而由墜簡書體的楷隸相參、草隸相參的特質，鄭氏乃進而參悟「隸楷相參」之理。鄭氏在《述隸書向元詩》又云：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103] 同上。

[104] 鄭孝胥著、勞祖德編，《鄭孝胥日記》，頁1548。

[105] 同上，頁1602。

[106] 鄭孝胥，《海藏書法抉微》。崔爾平編，《明清書法論文選》，頁944。

ｱiIfｻ･､､･indd　186　2005/12/5　､U､ﾈ 05:31:14

> 《禮器》超詣含高深，《史晨》淳奧法易深。《石門》雕疏《華山》密，宏博肅括惟《蕩陰》。意理古淡若《西狹》，《樊敏》難遇懷蕭森。漸方漸厲氛甚惡，降及曹魏加崎嶔。墨本摩挲疑莫釋，一玩《墜簡》如生擒。[107]

詩中力陳《禮器》、《史晨》、《石門》、《華山》、《張遷》、《西狹》、《樊敏》諸漢碑各具風格，惟漢以下則風氣漸壞，出現「漸方漸厲氛甚惡」之弊；降至曹魏，更發展出「崎嶔」的習尚。幸而墜簡「如生擒」的書風正能接武漢碑，與眾漢碑各領風騷，加以「墨本摩挲疑莫釋」，墜簡乃確信無疑的漢、晉墨跡，直是學書的最佳途徑。

鄭孝胥對簡牘價值的理解，無疑是從極其具體的書法創作角度著眼。另一書法家李瑞清則以復興此古體之筆法而自任：

> 余近見流沙墜簡，欲以漢人筆法爲此體(章草)中興也。[108]

由羅振玉向遺老書法家如沈曾植、鄭文焯、鄭孝胥的大事推廣，可想見當時遺老圈中得悉墜簡出土或得閱《流沙墜簡》一書的遺老書家實不止此數，但在理論上有建樹的尚屬少數，正如繆荃孫早得知其事，卻未有建立理論。而沈曾植、鄭文焯、鄭孝胥、李瑞清等則敏銳地作出了理論的回應。且在創作上也在民國初年拓出了新境，將章草及簡書用筆融入創作之中，其後更演成民國書法創作的新趨勢，而沈曾植、鄭孝胥、李瑞清等更是其中的先行者。

iii)敦煌經卷

二十世紀另一重要出土書法材料為敦煌經卷。同樣地，在國人猶未知曉的情況下，羅振玉已率先從伯希和(Paul Pelliot, 1898-1945)處求得照片。

光緒二十六年(1900)，甘肅敦煌千佛洞石室寫經被發掘問世，大量唐代經卷出土。光緒三十二年(1907)斯坦因從敦煌石窟取走大量寫本文書。正如羅振玉所言，經卷出土初期，「我國人士初且未知」。[109]直至宣統初年(1909-1910)，羅振玉才由伯希和處得知其事。宣統二年(1910)，並得窺篋中所藏，後又得伯希和郵寄各種書目，乃撰為《敦煌石室記》印行。羅氏為保存文物，乃上奏當時任職之學部，與劉廷琛(1869-？)等共謀搜求。所獲雖不比伯希和，亦引起一陣哄動。不

---

[107] 同上。

[108] 李瑞清，《臨淳化古法帖》。《清道人遺集》佚稿，頁302。

羅振玉，《鳴沙石室佚書》序。《雪堂自述》，頁127。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ｱiｴfｻ･､､･indd　187　2005/12/5　､U､ﾈ 05:31:15

少其後成為遺老書法家者當時皆寓居京中，或正任職學部，故亦曾預聞其事。當時任職學部的曹元忠(1865-1923)致書其師繆荃孫道：

> 昨見學部友人，述及敦煌石室唐寫卷子本書已至，與內庫宋元槧同付嚴扃。日鉤月鑠，便是無形焚坑。未識吾杖履何日來都，爲書請命，望切雲霓矣。[110]

羅振玉亦時常把出土最新資訊告知友好，繆荃孫是其中一位：

> 又聞日本本願寺近於新疆得涼寫本《論語》殘簡，又涼西域長史李柏文書簡二通，晉太康六年寫經，天寶間畫佛，此類甚多。古物盡流入異域，而當道毫不加意，是可慨也！[111]

羅、曹等對經卷之保存及流通皆甚為關心，後端方得知其事，願承擔刊印流傳之責。端方乃致書繆荃孫，力邀其全權主理其事：

> 燉煌影片當全數奉公料量，請日內惠臨，當面交割。[112]

惜辛亥革命一役，端方入蜀平亂遇害，刊印之事亦無疾而終。惟在民國前已掀起收藏及研究經卷之熱潮，吳士鑑(1868-1933)、楊守敬及沈曾植都是其中的佼佼者。吳士鑑於年譜中曾記於宣統二年(1910)所得經卷：

> (宣統)二年庚戌年四十三歲……得燉煌石室北周建德二年大都督吐知勤明寫大般涅槃經卷子一，唐永徽三年普賢菩薩說明經卷子一……大歷二年崇福寺僧體清集維摩疏釋前小序鈔子一，背有大乘稻芋經疏一卷，皆石室中之至精品也。[113]

當時並非身在京師的沈曾植得知經卷出土，亦大為關心，曾致書繆荃孫請求代購：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110] 顧廷龍校閱，《藝風堂友朋書札》，頁985。

[111] 同上，頁1002。

[112] 同上，頁616。

[113] 吳士鑑編，《含嘉室自訂年譜》。北京圖書館編，《北京圖書館藏珍本年譜叢刊》（第192冊），頁211。

ｱiIfｻ･､､･indd　188　2005/12/5　､U､ﾈ 05:31:15

> 敦煌寫經，聞有流在廠肆者，公能爲我購致數卷，書跡不佳，存以識江(筆者按：「江」疑作「河」)西文物耳。[114]

須言之，經卷出土雖亦引起不少人注意，然當時予人在書法方面的震撼遠遜於流沙墜簡。究其原因，可從數方面考慮。首先，其書法不如墜簡受重視，沈曾植不正評其「書跡不佳」。經卷中多為經生小楷，其藝術魅力遜於墜簡為原因之一。其二，經卷在歷史上流傳已多，且最早者為南北朝墨跡，更多為唐代之物，無論其罕見程度及歷史意義均未及墜簡。其三，研究者皆為經卷中各種古代典籍鈔本所著迷，遂罕及其書法。被遺老書家認為與書法密切相關的主要是伴隨敦煌經卷出土的三種唐拓碑刻，分別為唐太宗(559-649)書《溫泉銘》、歐陽詢(557-641)書《化度寺塔銘》、柳公權(778-868)書《金剛經》，民國五年(1916)由羅振玉輯為《墨林星鳳》出版。

經卷的研究開展於清朝末年，並跨越民國，亦以遺老圈子作為核心。羅振玉先後整理成《敦煌鳴沙石室佚書》(1913)、《鳴沙石室遺書續編》(1917)、《敦煌鳴沙石室古籍叢殘》十九種(1917)等著作。沈曾植等遺著中各種經卷之題跋亦不少，直至沈氏晚年(1918)，仍著力於此，《張元濟日記》中有記：

> 本日送波斯教殘經抄本與子培，並索還茗齋集及敦煌殘經。[115]

可以說，經卷之研究，除羅振玉外，以沈曾植造詣最深。除了重視其文史價值外，亦以經卷印證書法風格，在民國八年(1919)所書《明文衡山草書千文卷跋》說：

> 嘗見唐人寫經，有作永師體者，意匠宛然，與二公相近，足知二公沿溯之所臻矣。衡老喜銳筆尖峰，亦是以唐法矯趙派末流之弊，非多見唐跡不知。[116]

遺老表面上是一個偏向封閉的小圈子，但是在學術層面上，他們並不固步自封，對於外國學者的成果甚為關注，甚至與外國學者交流，絕對不甘後人，因而在新知識上，其認識面絕不遜於嚐西學者。當民國五年(1916)伯希和途經上海，張元濟(1867-1959)設宴招待，並邀得遺老沈曾植、葉昌熾、張鈞衡、繆荃孫、劉承幹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

[114] 顧廷龍校閱，《藝風堂友朋書札》，頁181。

[115] 張元濟，《張元濟日記》(民國七年(1918)九月十八日)(北京：商務印書館，1981)，頁447。

[116] 沈曾植，《明文衡山草書千文卷跋》。崔爾平編，《明清書法論文選》，頁931。

ｱiｴfｻ･､､･indd　189　2005/12/5　､U､ﾈ 05:31:15

(劉氏未有應約)作陪客。試看葉昌熾之記載：

> 六月廿二日，晨起，案上有書，張鞠生京卿晚酌言有法國人畢利和，即在敦煌石室得古書攜歸其國者，今來中土研究古學，甚願與吾國通人相見，能操華語。亦有一函招翰怡，未知其在苕也。六點鐘如約往陪，客尚有藝風、乙庵、張石銘、蔣孟蘋。乙庵與客談契丹、蒙古、畏兀兒國書及末？婆羅門諸教源流，滔滔不絕，坐中亦無可攙言。畢君攜照片九紙，云是經典釋文堯典舜典兩篇殘帙。[117]

坐中以沈氏最滔滔不絕，與伯氏暢論學問。眾人並得觀伯氏所攜經卷照片，此亦當時上海遺老圈子的一次盛會。

須言之，甲骨、漢簡乃至敦煌經卷這些出土文物為二十世紀書法發展的重要參照材料。甲骨文長埋地下數千年，最終成為改寫中國書法史的寶貴材料，也為中國書法藝術開出了新道路，把金石書風推向新高峰。而漢簡為書法史的一大空白時段補上重要一節，即由隸到楷的轉捩點，此兩者皆近代書法史上之大事。且漢簡書風為書體融合及書體解放，使書法在藝術化的道路上找到了新的出路。亦正好配合書法在脫離實用，走向純藝術的過程邁向康莊大道。這一切都肇於部分遺老書法家的努力。

五、書法創作與新出土書法材料

1 簡牘的參照

在遺老生活的時代，因中國本土的學術界和藝術界對新出土書法材料所知甚少，以致流播未廣，但部分遺老書家已率先在理論上進行探索，進而付諸創作上的實踐。漢晉簡牘的出土，令書法家得見古代墨跡，進而反思古代筆法的重構，於書法發展史的重要性實不言而喻。而在遺老書家群中研究簡牘的風氣，使他們成為了簡牘入書的先驅人物。

在1914年《流沙墜簡》正式面世前，沈曾植已早著先機地從羅振玉處得悉其出土，並看到了羅氏提供的部分照片。其中古隸及章草的墨蹟，引起沈氏對書法史的思考，又進一步將這些材料結合到實際創作之上。並通過臨摹去領會其筆法，《臨木簡急就章軸》(圖3)相信就是這些臨作的其中一件。這是臨自《流沙墜簡》的第一部分「第一急就奇觚」(圖4)，可惜作品中沒有題寫年份，但從此作

[117] 葉昌熾，《緣督廬日記》，頁568。

ｱiIfｻ･､､･indd　190　2005/12/5　､U､ﾈ 05:31:16

乃為他人所書，可見其自信臨摹上已有所得。相較沈氏的臨作與原蹟，他無疑滲進了個人對這種筆跡的體會，並不拘泥於原蹟的形似。沈氏以隸書橫向的體勢去演繹墜簡書法的造型，這種演繹，可能正是他所理解的「古隸」筆法。在處理手法上，特別誇張撇、捺這些飛動筆勢，尤以撇的捲動輻度最為厲害。部分筆劃的若即若離，以及不求平衡統一的節奏，甚至錯綜跌宕、字體大小不一所構成的章法，為畫面平添了不少動態。當然，其中亦包含了較方折厚重、以及具金石趣味的行筆，此皆源自沈氏碑學書法的根柢。

簡牘對沈氏的啟迪，不僅在章草方面，更在整體風格的融化之上。其中最易印證的便是在隸書筆法上的變化。沈氏六十三歲(1913)時有《臨秀穎司隸校尉楊孟文頌》(即臨寫《石門頌》)(圖5)之作，此作結體端正，橫平豎直，筆劃疏瘦，行筆變化不大，與晚年風格迥異。相對於晚年所臨《禮器碑》(圖6)，顯見變得跌宕自然，筆劃躍動，極接近《臨木簡急就章》之風格。沈氏以簡書筆法臨寫《禮器碑》是可以理解的，因為他認為「急就篇」等簡，正與《禮器碑》的「細勁」書風近似。1922年所作《隸書扇面》(圖7)，寫來揮灑飛動，筆勢時而遲澀，時而迅疾，正融冶了簡書的靈動筆調，強化這種極具隨意性的民間書風的野趣。其行書草(《行書軸》1920(圖8))更巧妙地化合了這種野趣，使他的書法少了碑版的平板而增添自然韻致，此即所謂「生」的趣味的由來。

其實，有關沈氏晚年取法墜簡以尋求書風上的變革，前人早有說法，弟子王蘧常(1900-1989)曾道：

> 先生於唐人寫經、流沙墜簡亦極用力，晚年變法或亦得力於此。其學唐人寫經，捺腳豐滿，尤他人所不能到。嘗言「摹流沙墜簡，當懸臂拓大書之，取其意而不拘形似」。予嘗效其法，得益匪淺。[118]

只是從前未有人就此進行深入研究，也缺乏作品助證而已。如今得見沈氏有關簡牘書體的書學觀點，亦有臨習的實例，當證王氏所言不虛。

鄭孝胥取法簡牘也是早有記載，張謙在《海藏書法抉微》曾說：

> 隱居海上以後，於漢碑臨寫尤勤，墨本之外，兼取流沙墜簡之法。用筆超絕，下視儕輩。[119]

其實，鄭氏日記亦曾載他對墜簡的取法：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118] 王蘧常，《憶沈寐叟師》。《書法》，1985年第4期(總43期)，頁19。

[119] 張謙，《海藏書法抉微》。載崔爾平編，《明清書法論文選》，頁1002。

ｱiIfｻ･､､･indd　191　2005/12/5　､U､ﾈ 05:31:16

(1916年12月20日)爲商業中學作字數紙，臨《流沙墜簡》，頗有新意。⑳

如以上文所述民國五年(1916)春羅振玉將《流沙墜簡》贈予鄭氏起，由得書至加以臨摹，只在半年多後。期間有否臨寫，當然不得而知。惟一年多後，鄭氏顯然在墜簡筆法上頗有所得，由此確定了「楷隸相參」的理論，㉑並進行創作上的實踐。當有人求書墜簡時，他亦欣然接受：

(1918年6月18日)有求書《流沙墜簡》者，爲作二小幅。㉒

鄭氏說有人求書《流沙墜簡》，雖然不知此人身份，惟可推測這種新出土書法已引起部分人士的注意，並對鄭氏等在書法上的演繹賦予認同的態度。

鄭孝胥早年的書法，主要植根於顏、柳、黃山谷諸家。五十歲以前所作並不突出，楷書頗具館閣味道，1908年所書《蒙求字樣》(圖9)，猶欠筆力。行書雖然較具骨力，但未免枯瘦，過於飛動，尤其轉折之處，刻意求重，有刻露之態。㉓其變革乃始於晚年寓居滬上，不僅對《始平公》、《楊大眼》、《石門銘》、《瘞鶴銘》等南北朝碑刻大量臨習，對《張遷碑》、《西狹頌》、《史晨碑》等漢碑致力亦勤。㉔這正是鄭氏「楷隸相參」理論的實踐，也是強化其書法表現力的轉捩點。當然，「兼取《流沙墜簡》之法」更是其中關鍵。

晚年所書《濟眾亭記》(1918)(圖10)、《行楷聯》(1919)(圖11)是其「楷隸相參」的理論的體現。前者採用楷書體勢及肩轉，橫劃捺腳則儼然透出漢魏遺韻。後者雖標名「行楷」，然就用筆而言，稱隸書亦無不可，最具隸書特徵的撇捺與厚重的橫劃，已明顯化合於楷體之中。成熟期行楷之作亦較早年厚重，1922年所書《敘古千文》(圖12)是典型之作。較多保留了唐楷的肩轉，以及黃山谷書法縱橫擺闔的結體；同時加入了漢魏碑版的厚重筆意。在視覺效果上，強調上斂下肆的收放，使結體顯得俊拔挺健，饒具氣勢。

---

⑳鄭孝胥著、勞祖德編，《鄭孝胥日記》，頁1638。

㉑有關鄭氏何時確立「楷隸相參」理論的問題，據張謙《海藏書法抉微》載：「先生中年頗致力北魏，尤得力於《始平公》、《楊大眼》、《石門頌》。戊午(1918)之後，書法漸尚厚重，不復昔中峭麗，吾知先生楷隸相參之主張，始於此時，漸重碑學。」見崔爾平編，《明清書法論文選》，頁1003。

㉒同上，頁1733。

㉓曾克耑，《鄭孝胥其人其字》。《大人》第13期，頁53。

㉔張謙，《海藏書法抉微》。崔爾平編，《明清書法論文選》，頁1003。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ｱiIfｻ･､､･indd　192　2005/12/5　､U､ﾈ 05:31:16

至於李瑞清得見《流沙墜簡》後，則有「欲以漢人筆法為此體(章草)中興」之決心。馬宗霍(1897-1976)《霎嶽樓筆談》更記述取法漢簡也是李氏晚年書風轉變之因由：

> 余獨愛其倣宋四家，雖不形似，而神與之合，其行書尤得力於山谷。晚歲參以西陲木簡，益臻古茂。[125]

「倣宋四家」是李氏晚年受沈曾植勸告而作出融帖入碑之新轉向，除大力臨摹法帖外，尤以取法黃山谷最力(圖13)。李氏學書始自幼年對銅器銘文、兩漢分隸的臨習，二十二歲起致力北魏真書及六朝碑刻。二十六歲後，才學唐以後書法，更自稱「北宗」，以學習「鼎彝、漢中石門諸刻，劉平國、裴岑、張遷、禮器、鄭道昭、爨龍顏之屬」為尚。[126]從吉金、漢魏碑刻的學習，乃建立起質樸剛勁的書風(圖14)。然早年所作偏於瘦挺峭拔，仿金石剝蝕痕跡的顫筆未免生硬造作，至融帖入碑之後而稍有改善。晚年對漢晉木簡的參合，使其行書創作再創新風，因為墜簡書法正讓李氏認識到碑帖書風未兩極化前的原始形態。晚年部分作品正以簡書稚拙飛動的筆勢及寬舒的結體，化合了黃山谷劍拔弩張的用筆與峭拔的體格，形成古茂淵懿的新面貌。所作《行書聯》(圖15)以隸書橫向結體融行草飛動之姿於一爐，尤有古隸之神韻。沈曾植曾對他變法後的作品加以讚許：「吾尤喜其題評小字，居然漢代木簡風味」。[127]此乃沈氏為《李梅庵先生選臨法帖》所題讚語，而當中提及之「題評小字」，應是李瑞清為該帖所書題跋(圖16)一類書法風格。此作與李氏一般澀筆所書碑體書法有別，沒有過份刻意顫抖的筆勢，反以漫不經心之意態出之。字形結構方面，顯然融合了漢簡的特徵，楷隸兼融的結體，並以平整的橫畫減卻了隸書的波磔。古樸的字形裏，又融冶著篆與草的使轉，形成生拙而飛動的筆勢，尤以「手」、「筆」、「耳」、「即」等字最得古隸意趣。而這種被認為具「漢代木簡風味」的「題評小字」，也正是李瑞清用以書寫「欲以漢人筆法為此體中興」這「宣言」的同類風格，可見感受殊深。除了這

---

[125] 馬宗霍，《書林藻鑑・書林紀事》(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頁247。

[126] 李瑞清《衡陽曾子緝鬻書直例引》謂：「昔年(1894)同官京師同學書，余喜學鼎彝、漢中石門諸刻，劉平國、裴岑、張遷、禮器、鄭道昭、爨龍顏之屬，自號北宗。季子則學石鼓文、夏承、華山、史晨、太傅、右軍、大令，尤好鶴銘、般若，自號南宗，以相敵。余時頗自負，於時賢書無所可否，獨好季子書，以為有晉人風。季子亦獨喜余書，每作書，必各出相示，議論以為笑樂。」見李瑞清，《清道人遺集》，頁264。

[127] 見李瑞清，《清道人遺集》，頁6。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ｱiｴfｻ・、、・indd　193　2005/12/5　、U、ネ 05:31:17

種偏近行楷的「題評小字」外，李氏晚年題跋尚有極貼近漢簡隸體之作，《李某庵臨周散氏盤真蹟》題跋(圖17)即為一例。當中所書雖屬隸體結字，然行筆簡率直接，刻意拉近之字距，上下揖讓相配，加以書於格線之內，頗有簡牘書法在長窄空間中構建自然走勢的視覺效果。

可惜的是，曾熙的書法評論文字存世太少，難以得知他實質如何取法漢晉簡牘。然而，作為李瑞清的親密藝友，曾熙對李氏在這方面的探索理應知曉，何況曾氏晚年所作行書亦頗流露簡牘行筆之意蘊。而且，相較李瑞清，曾氏融和墜簡筆勢顯然來得更為諧協。曾氏早期書法深得晉人疏秀之致，主要取法具溫雅俊逸筆勢的南北碑帖，如《張黑女墓誌》、《瘞鶴銘》、《金剛經》等，正如康有為認為「由圓筆以下窮南碑，故其行楷各體皆逸。」[128] 此正道出曾氏書風雍容寬舒、蘊藉平和的特色(圖18)。所作行書(圖19)則較遒逸，然亦悠閒醇雅。越近晚年，行草書(圖20)越趨飛動放逸，橫畫結筆處不避出鋒，隱用漢簡技巧，或以停駐含蓄，形成對比。某些字的末筆，更見隸草相融之意蘊，以簡牘的草隸用筆融冶了今草的過於婉轉流轉，使圓處不滑，方處不滯，倍添拙厚。

從上述數家率先開啟取法墜簡之風，最能反映遺老書家在書法藝術上的開創性以及對書體演變的敏感度。墜簡為漢代日常書體，產生在未有強烈文人書學概念的時代，加上只是隨手寫就的公文式記錄，其用筆自由飛動，比之莊嚴的漢碑，有更豐富的意態。對於其時已積極探索書體參合的遺老如沈曾植諸人來說，更是不可多得，且亦是合時不過的材料。最重要的是這些文字都是以毛筆直接寫出的墨跡，對筆法的研究裨益尤大。從簡書獲得的飛動氣勢，正好啟發如何把碑派的用筆注入楷、行書體當中，因在過去的學習過程中，碑的凝重筆勢與帖的相對迅疾，在平衡上產生一定困難。漢簡書跡正好提供了思考方向的重要線索，難怪沈曾植一見而有所悟。

遺老書家就漢簡筆法的摻入，上述集中討論了沈曾植、鄭孝胥、李瑞清、曾熙如何參合隸、楷、行諸體，至於他們以漢簡筆法臨寫章草，更是直接而卓有成就的參伍。

2 章草的復萌

新出土材料在遺老群中引起關注，促成新的書法面貌。他們以學術研究的比照參引的方法作為基礎，新出土的文字變成對傳統建立在碑與帖筆法上的互為引證的實據。遺老對這些新書法材料的掌握，並非單純出於視覺元素的追摹，因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128] 馬宗霍，《書林藻鑑・書林紀事》，頁245。

ｱiIfｻ・、、・indd　194　2005/12/5　、U、ネ 05:31:17

此，在「書體參伍」的取向，並非只流於新出土文字，也重新審視本有的碑帖。誠如章草的研究得到重新重視，正是由於漢晉簡牘的發現。遺老書家們雖然驚嘆這批千年墨跡的生動和變化萬千，但畢竟這些文字所能提供的，只是一種時代精神面貌和各種未經法度繩規、純出書者個人用筆喜好習慣的表達形式。故此，在實際參合時，他們又結合《急就章》等古代章草刻帖所傳下來的章草筆法。故在「參伍」的過程中，章草成為進入漢簡墨跡的門徑，而漢簡墨跡則成為脫去原有法度枷鎖的鑰匙。可以說，遺老書家所追求的不獨是造型上的「書體參伍」，更是深化到筆勢上的參伍。他們期望透過這種參伍引證的方法，復原真正的「古法」。

章草在清代是一種幾乎被遺忘了的古代書體，民國年間驟然書寫成風，與漢簡墨跡的出土大有關係。漢簡中的章草字體，直接促成書法家思考「章草」古體的原始形態，李瑞清即指出：

> 世所傳草書，自明以來皆素師派耳，其原出大令，及放者爲之，則粗獷而狂怪，章草久已無傳。余近見流沙墜簡，欲以漢人筆法爲此體中興也。[129]

李瑞清回顧近代草書發展之單調，皆由源出王獻之(344-386)與懷素(725-785)一脈而來，及其末流，遂成「粗獷」、「狂怪」之風。如今得見墜簡章草墨跡原貌，自較數代以來陳陳相因的今草更趨高古迫真。他進一步認為這就是漢人筆法，並要以這種筆法復興章草的頹態。

對今草作出反思普遍存在於上海遺老書家群中，鄭孝胥亦對懷素的草書作出批評：

> 作草莫作草，懷素尤爲厲。君實與明道，不草究何礙？時人解章草，黃、謝若小異。雲間周思兼，獨往擅妙詣。行草推覺斯，米老鋒猶銳。未若倪鴻寶，掩蘇當抹蔡。[130]

對懷素草書的否定，代表了對發展至唐代成熟期的草書傳統的挑戰，亦意味著民初書法家在草書審美上的轉向。民國三年，沈曾植與鄭孝胥曾就這方面進行討論：

(1914年11月11日)晨，過沈子培〔曾植〕……以日來所作草字示子培，子培若：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129] 李瑞清，《臨淳化古法帖》。《清道人遺集》佚稿，頁302。

[130] 鄭孝胥，《黃石齋手札詩》。見《海藏書法抉微》。崔爾平編，《明清書法論文選》，頁1004。

ｱiIfｻ･､､･indd　195　2005/12/5　､U､ﾈ 05:31:17

「薛道祖欲爲此體而未成就，宋高宗意亦在此，亦不能佳。知此途徑不易覓也。」余曰：「子敬嘗嘆章草宏逸，余又惡草書縱筆有俗氣，故欲以皇象、索靖爲歸耳。」[131]

鄭氏向沈曾植展視的應是章草作品。而由沈氏談及古人如薛紹彭(北宋神宗時人)、宋高宗(1107-1187)皆曾致力於章草，最終並無所成，歷代能章草者實無幾人，可見章草並不易為。鄭氏意會，回應沈氏，引述王獻之「章草宏逸」之說，並認為草書(今草)縱筆有俗氣，故此，寧取皇象(三國時吳國人)、索靖(239-303)二家章草。兩天之後，鄭氏忽有所悟，日記中曾述：

(1914年11月13日)作草。忽念以隸爲草、以草爲眞必有異趣，皇象、索靖實有此境。[132]

鄭氏認為皇象、索靖二家書風，正有「以隸為草、以草為真」之意趣。因章草本是一種「過渡型」書體，是由隸發展到今草的過渡，可算一種融和書風。

從上述鄭氏與沈氏討論章草的記載，可知沈氏對這方面亦甚為關心，在研究古隸章法及《急就章》方面皆下不少功夫。對於這種書體，過去以楷、行筆法寫就者都未見成功，箇中原因正由於章草本源於古代書體(隸書)，若以流麗的楷、行筆法為之，則容易淪為流滑勁利之俗筆。而漢簡的出土，為章草提供了最直接的範例。也正是這種不拘一格、自由飛動的表現形式，才能真正回復章草的本相。同時，遺老書家開始對《急就章》進行深入的研究。當時，沈曾植、李瑞清等都致力搜求《急就章》拓本，據王國維所述：

近日著手補輯《倉頡篇》，先從《急就》入手……《急就》葉本石刻尚在松江府學，李道士已遣人拓得二分。乙老意欲屬其拓五十分，此無成就之日。[133]

王氏述及沈氏欲拓松江本《急就章》五十分，可見其對此本之重視。信中更謂「李道士已遣人拓得二分」，可見李瑞清興趣亦濃。羅振玉於1917年刊印《明松江本急就章》，可視為對這熱潮的回應。沈曾植對此拓本更細心研習，其中一則題跋謂：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131] 鄭孝胥著、勞祖德編，《鄭孝胥日記》，頁1538。

[132] 同上。

[133] 王慶祥、蕭立文校注，《羅振玉王國維往來書信》(1918年5月25日)，頁369。

ｱiIfｻ･､､･indd　196　2005/12/5　､U､ﾈ 05:31:18

> 細玩松江《急就》，決爲唐臨不疑，有訛略之跡，而無訛略之情也。推跡以知情，是在善學者。[134]

而且，上海遺老書家間曾開展了一股章草(或《急就章》)的討論風氣。當時究心於章草的鄭孝胥相信亦是這次探索中的重要一員。

除了存世《急就章》拓本外，沈氏亦從出土《急就磚》進行研究：

> 漢《急就磚》，僅存廿餘字，猶有古隸筆勢，今在周景叔家。[135]

無論是《急就章》拓本或《急就磚》，最令沈氏著迷的乃是其中的「古隸筆勢」，正如他在另一則札記中談及：

> 《急就》是古隸章草，《月儀》是八分章草，右軍父子則今隸今草也。《急就》止右波，《月儀》左方起處收處皆有作意。[136]

沈氏認為《急就章》乃較能保存「古隸章草」面目的存世拓本，造形上有右方的波磔；而《月儀帖》的「八分章草」則左右皆刻意作態，與《急就章》自然古樸之風自是迥異。至若王羲之(307-365)、獻之父子的「今隸今草」則已古意盡失，變為「今隸今草」矣。從沈曾植整理《急就章》的研究過程中可見，他以拓本為基礎，參以「急就磚」(亦出土文字)及「流沙墜簡」作為復原章草古筆法的重要依據，而復原古筆法亦正是其終極目標。

在遺老書家的言論中，體現出一種為章草追本尋源的努力，最終目標乃是於文獻資料及出土書跡角度印證書法源流，亦出於一種在理論上復原古筆法面貌的意願。其中數人更迅速投入章草創作，或以章草筆法融合其他書體。

無論在章草的理論建構或創作實踐上，沈曾植都是重要人物。沈曾植晚年書法變革的關鍵更是取法章草。這固然受漢簡章草筆法的啟發，他又大量摹寫章草臨本，選取的臨本並非元、明如趙孟頫(1254-1322)、宋克(1327-1387)、祝允明(1460-1526)等近世之作，而是他最為珍視的章草古體臨本。他對《急就章》最為鍾愛，畢生藏有《急就章》拓本多個，[137]更極為稱揚此帖，謂：「今世所存章草

[134] 沈曾植，《海日樓札叢》卷八，頁301。

[135] 同上，頁304。

[136] 同上，頁308。

[137] 沈氏有《明拓急就章跋》六篇，見《海日樓題跋》卷二，頁56-57。

臺灣博碩學術期刊資料庫

ｱiIfｻ･､､･indd　197　2005/12/5　､U､ﾈ 05:31:18

帖，惟此最近真，惟此最近古矣。」[138]另王蘧常記載他尚取法其他臨本：

> 先生以爲凡爲藝事，不要蹈前人蹊徑。自清代康熙時風行董其昌，到乾隆時又好趙孟頫，以後風氣一變，流行北碑，但章草的領域，尚未有人深進。元代趙孟頫、明代宋克，都不免以楷法寫章草，明代祝允明寫章草，字多杜撰，尤不足取法，沈子培先生出而專攻章草，我因而也就步趨……從先生後，乃寫吳皇象《急就章》，漢張芝《秋涼》等帖……[139]

由此可見，沈氏的取法對象可能尚包括吳皇象《急就章》、漢張芝(？-約192)《秋涼帖》等章草範本。沈氏正有約書於1920年的《皇象帖》(圖21)、《王珣帖》、《張伯高步虛詞》等章草之作存世。

然而，臨習傳世章草古帖只是入門之徑，畢竟沈氏深感此等法帖「疆域褊小，殊難光大」，要能突圍而出，必需兼融各體，正如王蘧常述沈氏之教誨：

> 師又知予學《十七帖》，曰：「右軍書遠承章草，舊有傳本，已不傳。今傳章草，僅皇象《急就章》，索靖《出師頌》，蕭子雲《月儀帖》(舊傳爲索靖書，非。姚姬傳辨之詳矣。)數種而已，疆域褊小，殊難光大，汝能融冶漢碑、漢簡、漢匋、漢帛書，而上及於周鼎彝，必能開前人未有之境，小子勉之。」余敬志不敢忘。此予究心章草之始。[140]

王氏所述正是沈曾植晚年革新書藝創作的方向，而章草筆法就是他極力尋索的一種「古法」，徵之文字記載亦可證他晚年嘗醉心章草。鄭孝胥曾記載：

> 十一日……過子培，觀所作章草、隸書及詩數首。[141]

《鄭孝胥日記》所載乃民國八年(1919年)之事，考諸同期風格(《行書軸》1920(圖22))，沈氏部分作品的確出現濃烈章草的特徵，章草的橫向走勢及盤纏遒逸的筆觸顯而易見。又如《章草軸》(圖23)，在處理章草筆法時，務求納其高渾而去其凝重，點畫時出章草筆致。加以此乃放筆直書之作，以「墨戲」態度視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138]同上，頁56。

[139]王蘧常，《憶沈寐叟師》。《書法》，1985年第4期(總43期)，頁19。

[140]王蘧常，《王蘧常書法集自序》。見《王蘧常書法集》(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

[141]鄭孝胥著、勞祖德編，《鄭孝胥日記》民國八年(1919年)九月十一日，頁1803。

ｱiIfｻ･､､･indd　198　2005/12/5　､U､ﾈ 05:31:19

之，字體參差錯綜，墨韻乾濕對比強烈，線條辛辣遒勁，形成高古而縱逸的草書風格。

此外，李瑞清與曾熙這對藝壇朋友都是重新開發章草古體的健將。上文曾述他受墜簡筆法啟迪，深感章草不振，故有以漢簡筆法為此體中興之決心。他如何取法，目前未有足夠材料可資論述，惟他有《臨皇象急就章》(圖24) 一作存世，可略窺他於章草上的風格。該作題跋謂「皇象急就章，以夏承法臨之」，可見他認為《夏承碑》筆法與章草有相融之處。在表現手法上，他吸收了章草寬博糾纏的造形，部分點畫、轉折亦帶有章草特點。然行筆極慢，澀筆的運用構成一波三折的效果，與一般遒勁放逸的章草筆法略有分別。

相對而言，曾熙章草作品存世較多。且馬宗霍在論述曾熙的書法發展時，曾充分肯定了他在章草方面的開拓成就：

> 章草不振久矣，雖唐宋大家，亦於此遜謝，明之宋仲溫略有六朝風度，可謂空谷逸響，然猶從閣帖悟入，未能望皇、索之牆也。至曾先生出，知章由隸變，與八分同源，因合分隸以爲之，遂以默契漢矩，奄邁晉規。[142]

雖然有關曾熙論述章草的文字已不可復見，然從馬氏評其「知章由隸變，與八分同源」的省悟，可見亦與其他遺老書家從漢簡筆法體會所得的情況相近。而且，李瑞清在此方面正有深刻體會，以二人相交之深，曾熙理應不會全然不知。且李氏曾遣人拓得兩份《松江本急就章》，未知曾熙可曾被贈予其中一份，曾熙正有書於1920年的《撫松江學宮本》(圖25)章草，可能正源出於此。觀曾氏所臨，與元、明人《急就章》流麗婉轉之風大異其趣，更沒有重按輕提而波磔外送的典型捺腳或刻意的迴轉，有的只是一種自由揮灑的筆調，以及相對樸拙而遒勁流轉的線條。這種筆法，與簡牘中「草隸」放逸自然的筆法頗有契合之處。晚年所作草書(圖26)，章草用筆特徵屢見，形成鬱勃而饒具古意之風。一般之行草書(圖27)，亦滲化了章草筆法，令本為迅疾的草書線條，變得意態更趨遒逸。偶爾加上具節奏的飛白，倍添生拙之趣。惜曾熙「不輕為人作，故草蹟流傳，不若他體之盛耳。」[143] 此亦世人罕知曾氏在章草上的創造之故。

民國期間，章草在上海遺老書家群中得以復興，及後廣披書壇。除了沈曾植、曾熙等取法漢簡及《急就章》外，其他見諸文獻記載，亦曾致力於章草的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142] 馬宗霍，《書林藻鑑・書林紀事》，頁245。

[143] 同上。

ｱiIfｻ・、、・indd　199　2005/12/5　、U、ネ 05:31:19

尚有鄭孝胥、[144]葉爾愷[145]等，只是如何取法，因資料散佚，暫時無法理清箇中頭緒。而自二十世紀初部分遺老書家開展探索復興章草筆法後，至二、三十年代，寫章草者漸多，他們不但擅寫，對此書體更有深入研究，由此也說明了遺老書家開風氣之先的貢獻。

3 甲骨入書

眾所周知，對新出土甲骨文進行深入研究的是羅振玉，而以甲骨入書也是由他首開風氣。羅振玉於1911至1919年旅居日本期間，對甲骨文字傾全力搜求、研究，歷經多年的考釋臨摹，對於書法進一步心摹手追。至1921年，以甲骨文字能識者甚少，為了滿足求書者及個人創作上的需要，遂以三日之力集得百聯，「用助臨池」。[146]嗣後又續集一百五十聯，合為一冊。當時，與羅振玉交往甚篤而又寓居天津的遺老章鈺等人也喜用甲骨文字集聯作書，於是至1927年冬末，羅氏遂將四人所集的四百二十聯合為一編。遇有求書者，多以契文為報，羅繼祖曾記載：

> 辛酉年我八歲，已能記事，每見公爲人寫楹帖，總是集契文，大小篆倒反而少寫，以後也常常如此，如果人家不指明要哪一體的話，就統以契文應之。[147]

可見由1921年起，羅振玉開始以甲骨文為書法創作的主要方向。

羅氏所書甲骨可分為兩類，叢文俊將其分為「臨寫原刻辭和集聯」兩個類別。[148]第一類摹寫刀刻意趣為主，字形較小，羅振玉編寫的《集殷墟文字楹帖》正是如此。偶有以細字摹寫甲骨，《甲骨文成扇》(圖28)為一例。筆法上，他力追甲骨文的刀筆韻味，起筆、收筆皆露鋒尖削，盡量保持甲骨原貌。章法上，完全按照甲骨原刻錯落分佈的模式書寫，表現出卜辭縱有行、橫無列的書寫形式，並附加釋文，可見出於臨摹之心。然從書有上款來看，他是為人所作，可見視為書法創作。第二類則以篆書筆法書寫甲骨文，字形較大，均屬對聯形式。

---

[144]張謙《海藏書法抉微》載：「先生於草書造詣亦深，惜為真書掩矣。準之前論，先生於楷書既主楷隸相參，故草亦近章草。」見崔爾平編，《明清書法論文選》，頁1003。

[145]許振軒，《爨龍顏碑集聯・序》。見《從爨龍顏碑說到集聯》一書。

[146]羅振玉，《集殷墟文字楹帖・序》。載《集殷墟文字楹帖匯編》(上虞羅氏貽安堂，1921)一書。

[147]見羅繼祖，《集殷墟文字楹帖・跋》。所載同上。

[148]叢文俊，《雪堂書法敘論》。《中國書法全集》(第78卷)(北京：榮寶齋，1993)，頁2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ｱiIfｻ・、、・indd　200　2005/12/5　、U、ネ 05:31:19

1923年書《集甲骨文聯》(圖29)屬這一類別，均採用篆書筆法及較勻稱的結體，將原刻的錯綜章法化為規整。整體而言，他以體勢開闊、結構謹嚴的一期卜辭為宗，[149]參以中鋒篆法，堅實挺拔的結構字形，既古意盎然，又能別具心裁。張俊之在分析羅氏甲骨文書法時，認為他吸收篆意而加以雅化，用筆改變了甲骨刻辭恣肆放縱的瘦勁，而為玉箸篆的圓韻豐滿，起筆藏鋒，收筆斬齊。結體亦效篆法縱長之結體，大小整齊，點畫平衡對稱，協調統一，形成嵩雅而質樸、端莊謹嚴的風格。[150]可以說，羅氏甲骨書風早期傾向粗筆(《集甲骨文聯》1923(圖30))，接近金文風格；晚期趨於細筆(1933《甲骨文十言聯》(圖31))，鐫刻神韻漸濃。可以說，兩種筆法基本已包括了其後書法家演繹甲骨文的主要風格。

到了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當書壇對羅振玉以甲骨入書之舉作出回應時，另一遺老書法家孫徵(1866-1952)亦投身甲骨文書法創作之行列。孫徵晚年居滬，鬻字為生。其平生研究甲骨文字極精深，所書雅逸有金石趣。孫徵寫甲骨文走模仿刀刻痕跡的路向，1939年的《甲骨十二言聯》(圖32)，以極細勁的線條，頭尾尖削的筆劃寫成。相對甲骨原刻，他無疑把甲骨線條寫得更瘦硬挺拔，而長短參差也變成了平正整齊，營造了精緻雅潔的甲骨文書風。加以每每將甲骨書於格線之內，旁邊附加釋文，這就更見把甲骨創作模式規範化之意向。故此，無論是羅振玉或孫徵，他們在甲骨書法上的實踐，皆為後人開闢了啟導之路。

六、對新出土書法開拓的成就

遺老書法家於新時代書壇的貢獻，莫如對新出土書法的整理研究。雖然這些遺老書家進入民國時期已垂垂老矣，一般只存活至二十世紀二、三十世代。他們對新出土書法材料的研究與引入書藝創作，都只能是開端，但卻饒具歷史意義。有關甲骨、漢簡等新出土書法對二十世紀書法發展的影響，學者論述甚多，如劉正成先生認為：

> 我曾經說過，如果撰寫中國書法史，在描述二十世紀中國書法的特點時，毫無異議，漢簡古隸與甲骨文融入書法創作，是二十世紀書法的最大特徵。到了今天的世紀末，已經罕有書家的創作不或多或少地吸收古隸書法的因素了。[15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149]任平，《羅振玉研究》。陳振濂主編，《近現代書法史》(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8)，頁279。

[150]張俊之，《羅振玉對甲骨文書法的貢獻》。《書法》，1998年第3期(總120期)，頁43-44。

[151]劉正成，《二十世紀中國書法的回顧》。《中國書法》，1999年第8期(總76期)，頁7。

ｱiｴfｻ･､､･indd　201　2005/12/5　､U､ﾈ 05:31:20

然而，在進一步分析這個由新出土書法所帶起的「書法潮流」之時，劉氏卻說：

> 這一書法潮流，是從本世紀的中期開始的，在未來的世紀，將會進一步拓寬境界，開創新局面。這一書風的濫觴期的代表人物，在甲骨文取法方面，當推羅振玉、董作賓和黃賓虹，在古隸取法方面，當推剛剛過世的錢君匋(1906-1998)，而成就最高者，當推王蘧常(1900-1989)。 ㉜

甲骨入書，劉氏以羅振玉為開創者，在目前可見材料印證下，是毋庸置疑的事實。而由出土簡牘促成對古隸的取法，劉氏以錢君匋、王蘧常為例，則已跳過了一段曾有眾多遺老書法家參與的民初時代。劉氏把這個「書法潮流」推至本世紀的「中期開始」，顯然與事實有距離。過去持此觀點的學者亦不少，更有直指接觸新出土書法者為「麻木不仁」：

> 甲骨、漢晉簡牘殘紙、敦煌寫經，均於本世紀初開始被發現，但當時的書家卻鮮有問津者，其原因或爲康、吳等人的書法籠罩，或言書家之宗旨以摹古爲主，對接受新鮮事物麻木不仁……當然這一時期缺乏敏銳的理論家也是造成這一現象的原因之一。只有羅振玉(1866-1940)在研究甲骨文的同時，開始以甲骨文爲素材進行創作，其他出土書跡幾乎在當時書家的筆下沒有反映。 ㉝

然歷史的真實並非如此，雖然這群遺老書家沒有直接參與發掘，但是，他們卻是國內文藝界最早接觸並開發研究這些新出土書法的人物。甚至當外國人把瑰寶從地下發掘出來後，國人未加重視，新知識界未有能力參與研究之際，多位遺老書法家已率先參與整理研究，流傳推廣，更初步奠定了理論基礎，部分更開展了在書法藝術上做臨融會的新里程，為往後的書學研究及書法創作，打下堅實基礎。

1 甲骨入書與新書體的創造

甲骨的出土，當時一般人知之甚少，收藏者尚屬少數，研究者更是幾希。甚至有些學者，在缺乏實證材料、妄加判斷的情況下，對甲骨文的真偽抱懷疑態度。文字學家兼書法家章炳麟(1868-1936)甚至否定甲骨文的可靠性，謂龜甲文字，乃向壁虛造，不足憑信。在其《小學略論》一文中道：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㉜同上。

㉝見黃惇，《當代中國書壇格局的形成與由來》。中國書法家協會研究部編，《全國第五屆書學討論會論文集》，頁57。

ｱiIfｻ･､､･indd　202　2005/12/5　､U､ﾈ 05:31:20

> 至如今人嘩傳之龜甲文字，器無徵信，語多矯誣。皇古占卜，蓍龜而外，不見其他。《淮南子》云……可見古人稽疑，靈龜而外，不事骨卜。今乃獸骨龜厭，紛然雜陳，稽之典籍，何足信賴……夫鐘鼎文字，尚有半數可認……若彼龜甲文字，果可信耶？否耶？[154]

當時，羅振玉與王國維獨排眾議地對這種「寂寞之學」持續研究，並進行大規模的整理和釋讀，不僅為研究商代歷史提供了大量材料，同時對文字學的研究也起了巨大的推動作用。從羅振玉開始，學者通過對甲骨文的研究，一方面糾正了許多《說文解字》的舛誤，特別是前人對古籀字形的認識；另一方面，甲骨文與金文的相互對照參證，對正確地釋讀金文亦大有裨益。這樣，無疑對後人以甲骨，甚至金文、篆籀等古代文字進行書法創作裨益極大。在羅、王致力研究之時，其他遺老如沈曾植、繆荃孫等對他們的支持也是不可抹煞的事實。還有李瑞清將甲骨文置於書法史的源頭，結合金文作出風格分類，梳理出商周書法的發展脈絡，在書學理論體系的發展上實一創舉。1932年董作賓(1895-1963)發表《甲骨文斷代研究例》，系統地分析甲骨書體的風格特色，要比李氏遲十年有多。《甲骨文斷代研究例》一文，提出了甲骨文斷代研究的「五期分法」和「十項斷代標準」，正式開展了甲骨書法風格分期的論述，是研究甲骨書法的一大突破，然其成就乃建立於前人的材料及研究基礎之上。

羅氏將甲骨文引入書法創作，成為近代書家利用甲骨文字進行書法創作的開創者，對中國書法的發展意義相當重要。正如陳振濂先生說：

> 在當時北碑派、唐碑派或二王派此起彼伏之時，敢於涉險去寫古人所無的甲骨文，這本身就是一種創新，一旦它被引向深化，就有可能形成新的書法創作格局。[155]

據記載，早在光緒二十五年(1899)甲骨文出現之初，天津人孟定生(活躍十九世紀末)就購藏過甲骨並曾臨寫過，可以說孟氏是甲骨文書法的最早涉獵者。然而，目前能見到最早的甲骨文書法是羅振玉所書的，遂使羅氏成為近現代書法史上精擅甲骨書法的第一人。[156]而羅氏率先以甲骨文字集聯，章鈺、葉爾愷等亦繼之，遂帶動甲骨文集聯之風，丁輔之(1879-1949)《商卜文集聯》、《觀水遊水集》；簡經綸(1888-1950)《集古詩聯》；董作賓及汪一庵(活躍於二十世紀)的《集契集》都

---

[154] 章太炎，《小學略論》。崔爾平編，《歷代書法論文選續編》，頁769。

[155] 陳振濂，《現代中國書法史》(河南：河南美術出版社，1993)，頁96。

[156] 于茂陽等，《二十世紀中國書法史》(河南美術出版社，1998)，頁135。

臺師大學術期刊資料庫

ｱiIfｻ･､､･indd　203　2005/12/5　､U､ﾈ 05:31:21

相繼問世。然而，沒有羅振玉的深厚文字學根柢，不易達到高水平的製作，正如後人評其「所集對聯，錯字不多」；[157]而簡經綸所集則錯字甚多。[158]可以說，甲骨文集聯對後人從事甲骨書法創作嘉惠甚大，它為一般沒有深厚文字學造詣的書法家，提供了甲骨書寫題材的更多可能性。

以甲骨入書，對羅振玉本身而言，已是一種書法新風格的創造，即如羅繼祖說：

> 先祖雪堂公早年習大小篆，中年見到殷虛文字，於是師法一變。[159]

甲骨文成為了羅振玉晚年書法創作的主要書體。而且，他寫甲骨文要求極為嚴格，從不臆造和妄加改纂，以集字的態度進行嚴肅的創作，不是同一時期的甲骨文絕不互相摻雜使用在同一作品之中。他以篆書筆法寫甲骨文，力圖重現甲骨「寫」的面貌。學者認為「正是由於他有著深厚的書法根柢和非凡的甲骨文眼力，他的這類作品往往不是簡單『影摹』，而是帶出了自己的一貫審美傾向來，那便是：平實、整雅、端和。」[160]這種演繹手法，雖然導致甲骨文原刻的特質有所遺失，但也卻是對書體融合的一種可貴嘗試。而另一遺老書家孫儆則致力於甲骨文刀刻痕跡的開發，與羅振玉的筆法構成後世甲骨文書法的兩種主要表現形式。

羅振玉對甲骨學和甲骨文書法的傳播，更透過他的學生和羅、王之學的繼承人輻射出去，成為甲骨學和甲骨文書法的主流，覆蓋全國，影響海外。他們的學生甚多，遺老商衍鎏(1874-1963)之子商承祚(1902-1991)，柯劭忞(1850-1933)之子柯昌泗(1899-1952)均是羅氏的入室弟子。當中尤以商承祚的甲骨學成就最大。他於1922年拜入羅振玉門下，學習文字學，尤嗜殷墟文字，羅氏對他期望殷切，稱譽為「將來成就，未可限量」。[161]並極力向王國維推薦，請王氏指授。商承祚編訂《殷墟文字類編》巨著，王國維親自校訂，進而增補修正。[162]出版之時，又為之作序，提攜後進，不遺餘力。而容庚(1894-1983)、董作賓、丁山

---

[157]嚴一萍，《甲骨學》（台北：藝文印書館，1978），頁1350。

[158]詳見李宗焜，《從分期分類談甲骨書法風格》。載於《出土文物與書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壹-12。

[159]羅繼祖，《集殷墟文字楹帖》跋。見《集殷墟文字楹帖》一書。

[160]任平，《羅振玉研究》。陳振濂主編，《近現代書法史》，頁280。

[161]王慶祥、蕭立文校注，《羅振玉王國維往來書信》，頁535。

[162]同上，頁545。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ｱiIfｻ･､､･indd　204　2005/12/5　､U､ﾈ 05:31:21

(1901-1952)都是羅、王在北京研究所任教時的研究生，[163]他們都成為了二十世紀後半期甲骨文研究的中堅人物。

甲骨學在二十世紀二十年代中期興盛起來，許多文字學家秉承羅振玉之傳統，研究甲骨之餘，兼及書法創作，意味著學藝並重的取向，豐富了甲骨文的藝術內涵。所書各具風範，如商承祚所作(圖33)運筆秀勁，質樸凝練；丁佛言(1878-1930)(圖34)則用筆挺健，結構勻稱，章法有序；董作賓出於鐘鼎，落筆粗，收筆細，筆致秀朗，端麗典雅；王襄(1876-1965)凝重古拙，深厚高雅；葉玉森(1878-1939)以刀代筆，粗細相濟，勁健峭拔。而他們學藝並重的傳統，體現了中國書法的藝術境界。其後風氣漸開，一般書法家也投入創作，甲骨文乃成為中國書法創作的獨特體系。

2 漢簡筆法與章草的復興

清代草書的發展卻步不前，究其原因，一方面由於清初已為館閣體所籠罩，桎梏了書法家的性靈。及後碑學大興，書家皆取法於金石碑版，篆、隸二體因時而興。正如沙孟海先生(1900-1992)認為「清人篆隸，確實超乎前代。」[164]在碑版、墓誌、造像的取法下，楷書亦每有突破，名家亦多。然而，清代草書大家可謂乏善足陳。直至民國初年，部分遺老書法家重新投入草書創作，才打破了這種局面。對碑學進行反思既是部分遺老書家的共識，對草書的衰落進行反思也同出一轍。楊守敬曾指出：

> 國朝行草不及明代，而篆分則超軼前代直接漢人。[165]

晚年的康有為也不得不承認碑學大盛對草書構成的壓抑，弟子劉海粟(1896-1994)曾述其意見：

> 晚年，他(康有爲)對我講到近代草書大家不多，是碑學發展後帖學衰微的另一偏向。[166]

碑學的興起，改變了審美的觀點，對古代書體的重溯成為時尚，從漢隸推衍

[163]張俊之，《羅振玉對甲骨文書法的貢獻》。《書法》，1998年第3期(總120期)，頁44。

[164]沙孟海，《清代書法概論》。《沙孟海翰墨生涯》(澳門：藝林出版社，1989)，頁125。

[165]楊守敬，《學書邇言・緒論》。崔爾平編，《歷代書法論文選續編》，頁714。

[166]劉海粟，《論鄭道昭》。見《書譜》，1985第4期(總65期)，頁20。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ｱiIfｻ・、、・indd　205　2005/12/5　、U、ネ 05:31:21

到草化了的隸體，亦同樣得到重視。漢簡的出土無疑加速了章草復興的進度，也提供了學習的最可靠範本。遺老書家如沈曾植、李瑞清、鄭孝胥等正是受簡牘中的章草墨跡所激發，對復興古體抱有極大的期望。相對於古代書法家，他們實在眼界大開。因為章草在書法史上，雖曾稱盛於漢代，卻隨著漢隸於魏晉以後的衰落而漸趨湮沒。這關乎書體的演變歷程，因楷書取代隸書、章草作為常用書體，結果，章草亦隨著隸書的被淘汰而消亡。元代趙孟頫、楊維楨(1296－1370)、明宋克等雖偶有章草之作，惟影響不大，亦與古人面貌無涉。因後世書家所謂臨習章草，根據的多是《淳化閣帖》中的刻本。這些拓本真偽莫辨，甚至有後人偽作摻入其中；尤甚的是，他們所用的始終是行書、今草的筆法。

西北漢簡的出土，使書法家得見古代草隸(雜有章草)面目，沈曾植、李瑞清、曾熙、鄭孝胥等對簡書中的章草印象尤深，並發展了章草的理論，對章草的推動，實饒具時代意義。在章草筆法的融合實踐方面，以沈曾植的成就最大。向燊(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上半期)對沈曾植草書上的成就已早作肯定：

> 書學包愼伯，草書尤工，縱橫馳驟，有楊少師之妙。自碑學盛行，書家皆究心篆隸，草書鮮有名家者，自公出而草法復明。歿後書名更盛，惜其草蹟流傳不多耳。[167]

沈氏開拓了章草、簡書的筆意，那個性強烈的行草書，正是以章草的結體及筆法融和碑體的凝重意態，更時而摻入今草的章法，創造出奇崛盤鬱，又方折遒逸的新風格。對於草書的發展，實有復興之功。誠如馬宗霍所言：「有清一代草書，允推後勁，不僅於安吳為出藍也。」[168]曾熙、李瑞清等在章草創作上亦多作嘗試，成就雖不及沈曾植，亦可謂開風氣之先。可以說，遺老書家以其深邃的帖學基礎，融匯博大的碑學識見，乃至簡牘的筆法，使草書徹底走出二王的界限，為草書的新紀元播下種子。

民國書家擅寫草書者甚多，多納碑版於行草之中，諸家風格標新立異，令草書繼宋明之後再稱雄於書壇。其中如王世鎧(1868-1933)、于右任(1879-1964)、張繼(1882-1942)、靳志(1883-1968)、鄭誦先(1892-1976)、王蘧常、來楚生(1903-1975)等的共同努力，將章草推至「漢晉之後的另一個高峰。」[169]從民國初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167]見馬宗霍，《書林藻鑑・書林紀事》，頁244。

[168]同上。

[169]王朝賓，《尚勢出新的民國書法》，見《民國書法》(河南省：河南美術出版社，1989)前言部分。

ｱiIfｻ･､､･indd　206　2005/12/5　､U､ﾈ 05:31:22

年到中期，草書的研究更形成獨立系統，促成了旗幟鮮明的草書運動。[170]在這草書風潮之中，最受注目的無疑是章草的復興。

此外，承接多位遺老書家的傳統，他們的弟子順理成章地成為第二代以漢簡入書的書法家。其中以沈曾植晚年入室弟子王蘧常最具代表性，王氏《武威漢簡跋》正記述：

> 武威漢簡出甘肅武威旱灘坡漢墓中……沈子培先生嘗言：「摹流沙墜簡當懸臂拓大書之，取其意而不拘形似。」予用其法摹之，果爲得手，尤於飛動處見精神也。癸丑暮春。[171]

王蘧常自言取法簡牘用筆實受沈曾植指引，同時又受沈氏啟迪而臨習章章，乃化合章草之結體，並以亦篆亦草之線條出之，形成雄厚蒼渾之章草風格(圖35)。

至於曾熙、李瑞清二人之弟子如呂鳳子(1886-1959)、胡小石(1888-1962)、張大千(1899-1983)等皆見取法簡牘書法之作。張大千早期之作深受二人薰陶，顯見李瑞清以顫筆入書之法，1934年作《隸書七言聯》(圖36)，自題「參用漢人匋器及流沙墜簡筆法為之」，這種參合，正是由其師及其他遺老書家所率先倡導。同樣師承李瑞清學書，又在李家任家庭教師三年之久(1917-1919)的胡小石，1914年初見《流沙墜簡》影印本，即揣摩對臨。[172]現尚存1910年代《臨漢簡》之作品(圖37)，風格與曾熙所作章草極為相近。[173]胡氏對漢簡更終身臨摹不輟，晚年所作分隸行書(圖38)，皆遒勁奇麗，筆勢變化多端。漢簡書法到了當代書壇更大放異彩，「漢簡熱」[174]曾在八、九十年代風靡一時，這些古趣盎然的墨跡成為當代書法家尋求任情率意、縱放逍逸的野趣的重要源頭。

---

[170]陳振濂，《民國書法史》(下篇)。見《書法研究》，1993年第3期(總53期)。

[171]王運天主編，《二十世紀書法經典・王蘧常卷》(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廣州：廣東教育出版社，1996)，頁143。

[172]吳白匋，《序言》。見《胡小石書法選集》(江蘇美術出版社，1988)。

[173]胡小石雖稱李瑞清弟子，然曾熙與李氏關係密切，二人往往把弟子相互授受，弟子同受二人影響之情況極為常見，張大千即為最佳例子。

[174]有關「漢簡熱」的論述，可參看朱以撒《當代書壇效法點剖析》一文，載金開誠等，《中國書法文化大觀》(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5)，頁658-659。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ｱiIfｻ・、、・indd　207　2005/12/5　、U、ネ 05:31:22

七、結語

由清代中葉碑學興起，書法打破了帖學獨尊的局面，復興篆、隸書體。由於碑學的興盛，某些副作用也顯而易見，如對草書的忽略，甚至碑學的矯枉過正，出現陶濬宣(1849-1915)這種徒具面目、生氣盡失的碑體書法。遺老書法家剛剛上接碑學反思的新時代，融會書風成為了部分書法家的出路，兼取眾長，參伍書體，都是沈曾植、鄭孝胥等孜孜不倦探索的道路。而且，他們更首先從新出土書法材料上著眼，並結合創作實踐，開拓了二十世紀以來以甲骨文、漢簡等新出土材料作為革新書風的濫觴。

可以說，透過部分遺老書家的努力，給二十世紀的書法史樹立了里程碑。甲骨文的研究，令書法史乃至文字發展的源頭要比過去兩千年來所知道的還要上推一千多年，把商代書法的存在正式納入信史時期。除了時間上的伸延外，更提供了空間上的擴充。漢簡和唐代經卷的出土，把大家的視界引向黃沙漠漠的西北邊陲。部分遺老更憑著他們對西北輿地的學問，結合西方學者的考古成果，打開了遼闊的中國書法領域。把從前直線發展的概念化書法史觀(即篆、隸、楷、行)的流程徹底打破，書法的年代分期、地域風格和時代風格也相應變得複雜而多元。過去的書法史研究，都是建基於文獻的描述及同代人所能見到的存世作品而作論斷。直至碑學的興起，已為實物(即書法作品)風格史的發展奠下先機。而民初遺老更是透過大量照片、印刷品和實物考釋，建立起新的風格史。二十世紀中國書法史的新方向，最明顯的就是古代書法部分的開拓，這種以實物而不是書家建立系統的方式，已獲得現代書壇的普遍認同。

基於書法史的時間和空間的開拓，所謂的傳統內容亦大幅地擴充了。[175] 從前由文人書家創作和遵守的法度傳統所未能涵蓋的各種民間化風格，以及過去見聞不及的新材料，都成為了新的傳統。如果從繼承傳統而言，二十世紀的書法內涵可以說是達到了歷史上空前的高峰。在二十世紀初期，西學襲來，許多人對傳統產生疑惑的年代，部分遺老卻把傳統進一步開拓，並為後來的發展打下根基。他們共同的成就，為書法由舊系統中轉生過來增添了契機。由於這一時期的開創性，使民初書法在體系上脫離了清代的系統。雖然只是一個開端，卻奠定了二十世紀中國書法發展的新走向。

（責任編輯：鄧民亮、廖佐惠）

[175] 詳見劉正成，《流行書風辨》。中國書法家協會研究部編，《全國第五屆書學討論會論文集》，頁14。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ｱiIfｻ･､､･indd　208　2005/12/5　､U､ﾈ 05:31:23



圖1　《流沙墜簡》「始建國」簡。載《流沙墜簡》，頁45。



圖2　《流沙墜簡》「折傷薄」簡。 載《流沙墜簡》，頁45。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ｱiｴfｻ･､､･indd　209　2005/12/5　､U､ﾈ 05:31:2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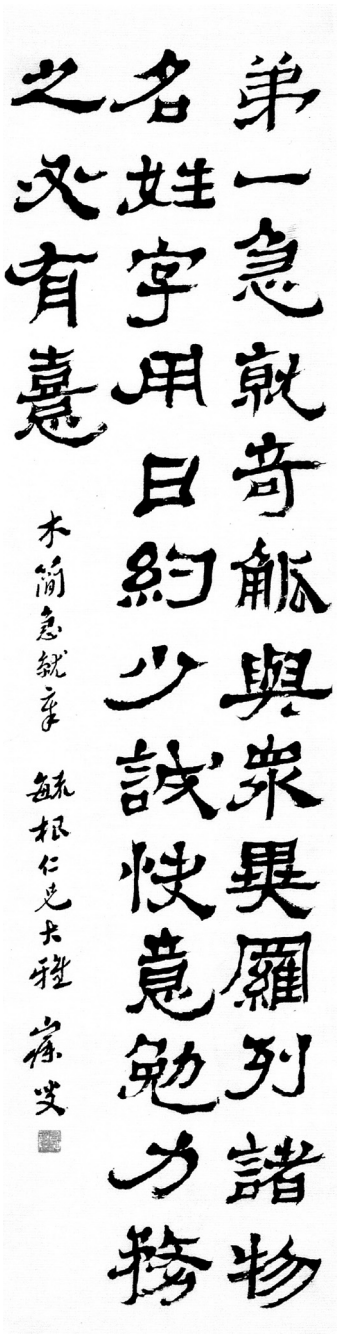


圖3 沈曾植《臨木簡急就章軸》。載《小莽蒼蒼齋藏——清代學者法書選集》(續)，圖167。



圖4 《流沙墜簡》「第一急就奇觚」。載《流沙墜簡》，頁13。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ｱiｴfｻ･､､･indd　210　2005/12/5　､U､ﾈ 05:31:2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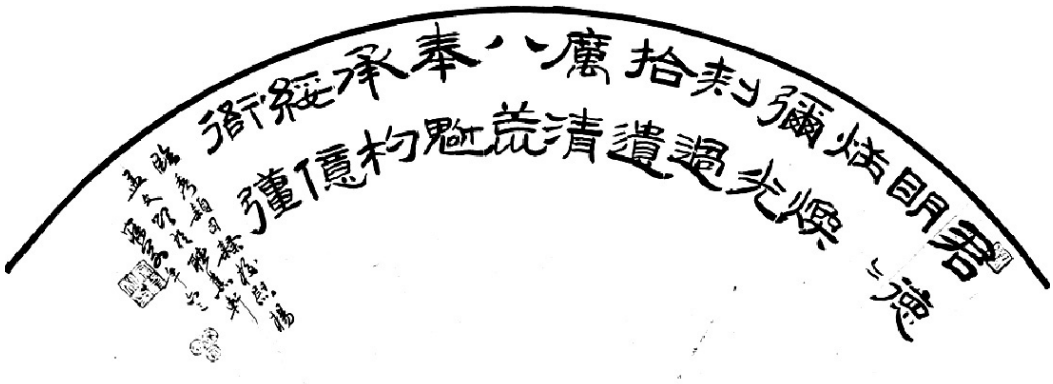


圖5　沈曾植《臨秀穎司隸校尉楊孟文頌》，1913。載《近代法書扇集》，圖2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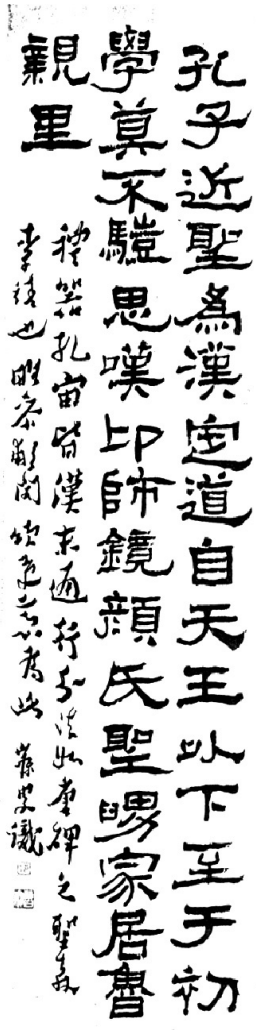


圖6　沈曾植《臨禮器碑》。載《明清名家書法大成》（第六卷），圖57。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ｱiIfｻ･､､･indd　211　　2005/12/5　､U､ﾈ 05:31:28



圖7　沈曾植《隸書扇面》，1922。載《中國現代美術全集・書法》（一），頁2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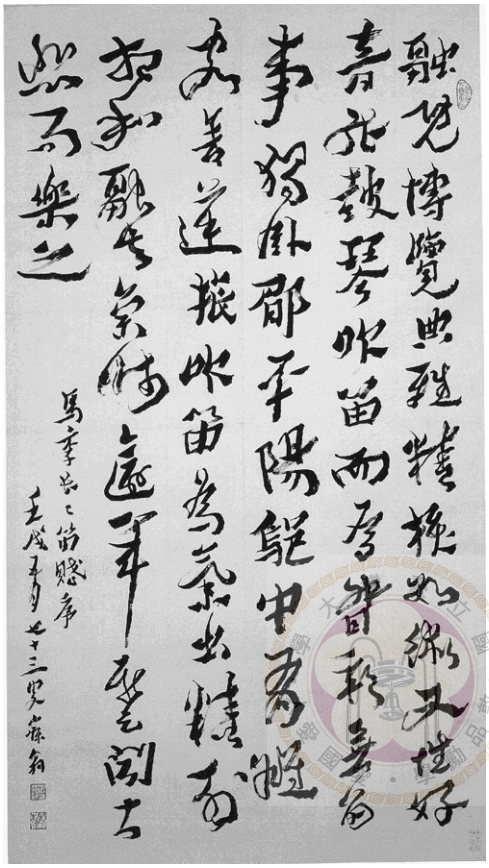


圖8　沈曾植《草書笛賦序》，1922。 Later Chinese Painting and Calligraphy, p. 139.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ｱiIfｻ・、、・indd　212　2005/12/5　、U、ﾈ 05:31:28



圖9 鄭孝胥《蒙求字樣》（部分），1908。



圖10 鄭孝胥《濟眾亭記》（部分），1918。載《中國書法全集》（78卷），圖87。



圖11 鄭孝胥《行楷聯》，1919。載《謝鴻軒教授書法收藏集》，頁69。



圖12 鄭孝胥《敘古千文》（部分），192。載《中國書法全集》（78卷），圖96。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ｱiIfｻ･､､･indd　213　2005/12/5　､U､ﾈ 05:31:31



圖13 李瑞清《行書軸》，1916。載Later Chinese Painting and Calligraphy, p. 131.



圖14 李瑞清《七言聯》。載《明清名家書法大成》（第六卷），圖7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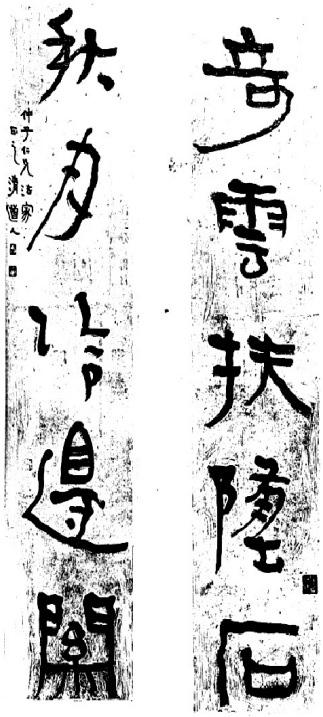


圖15 李瑞清《行書聯》。載《民國時期書法》，頁126。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ｱiｴfｻ･､､･indd　214　2005/12/5　､U､ﾈ 05:31:3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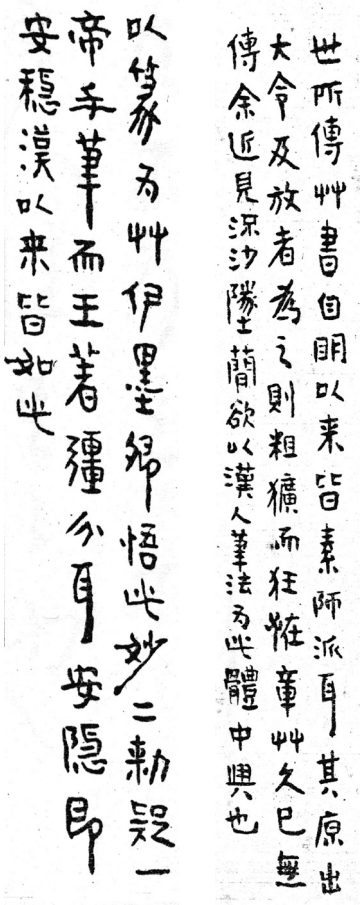


圖16　李瑞清《李梅庵先生選臨法帖》跋(部分)，約1914。



圖17　李瑞清《李某庵臨周散氏盤真蹟》題跋(部分)，約1917。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ｱiIfｻ･､､･indd　215　2005/12/5　､U､ﾈ 05:31:3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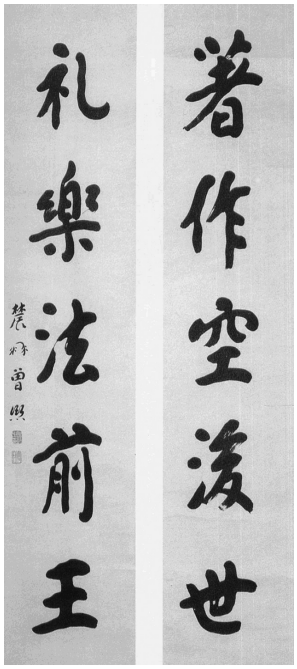


圖18 曾熙《楷書聯》。載《中國現代美術全集・書法》（一），頁4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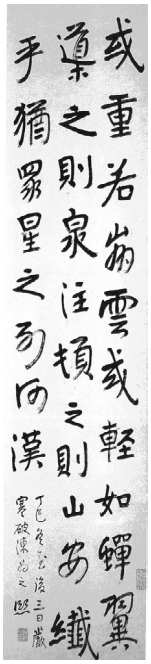


圖19 曾熙《行書軸》，1917。載Later Chinese Painting and Calligraphy, p. 15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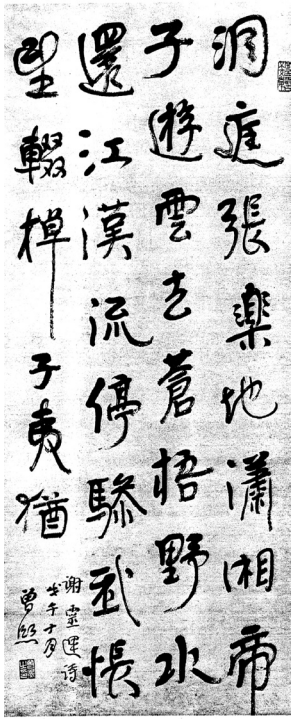


圖20 曾熙《行書謝靈運詩》，1918。載Sotheby's Fine Chinese Painting (N.Y.)1994.11.28，圖106。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ｱiｴfｻ・、、・indd　216　2005/12/5　、U、ネ 05:31:3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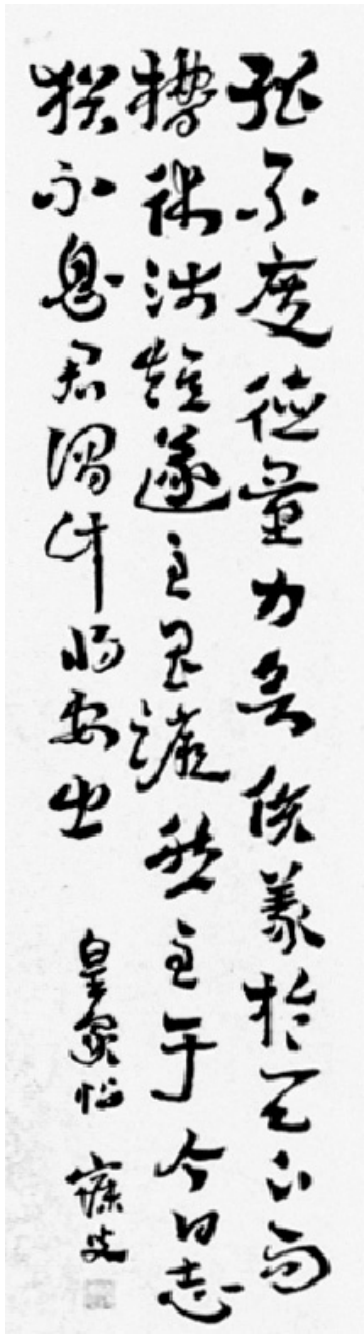


圖21　沈曾植《皇象帖》，約1920。嘉興市博物館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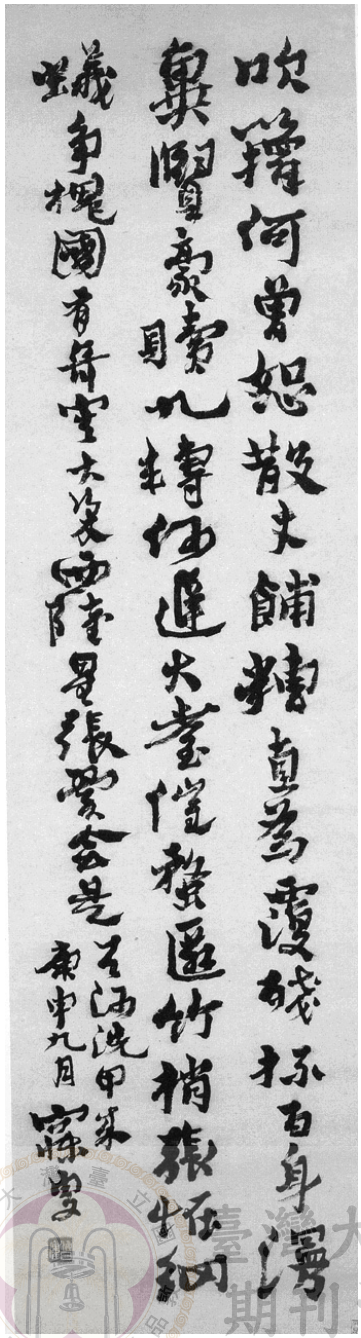


圖22　沈曾植《行書軸》，1920。載Later Chinese Painting and Calligraphy, p. 138.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ｱiIfｻ･､､･indd　217　2005/12/5　､U､ﾈ 05:31:3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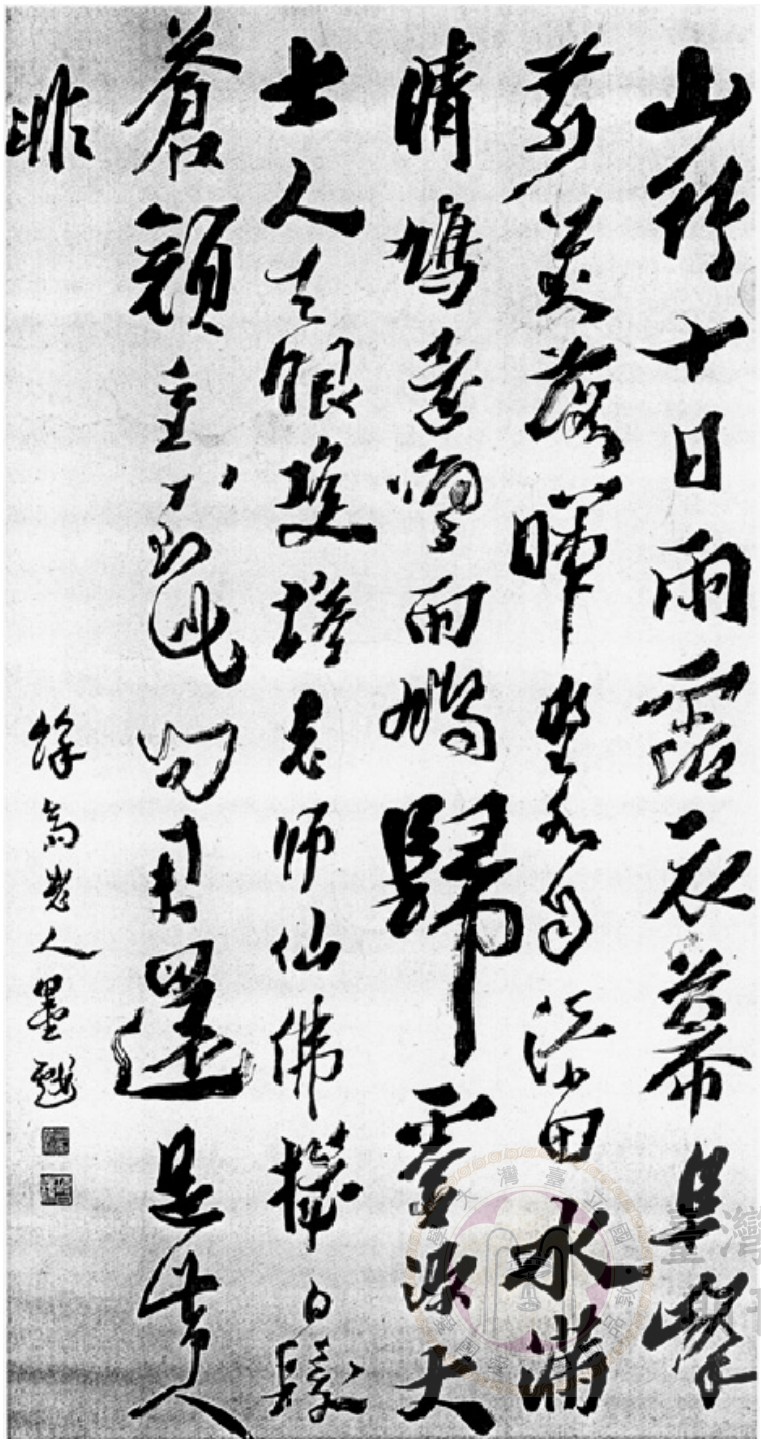


圖23 沈曾植《草書軸》。載《二十世紀書法經典・沈曾植卷》，頁74。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ｱiIfｻ･､､･indd　218　2005/12/5　､U､ﾈ 05:31:3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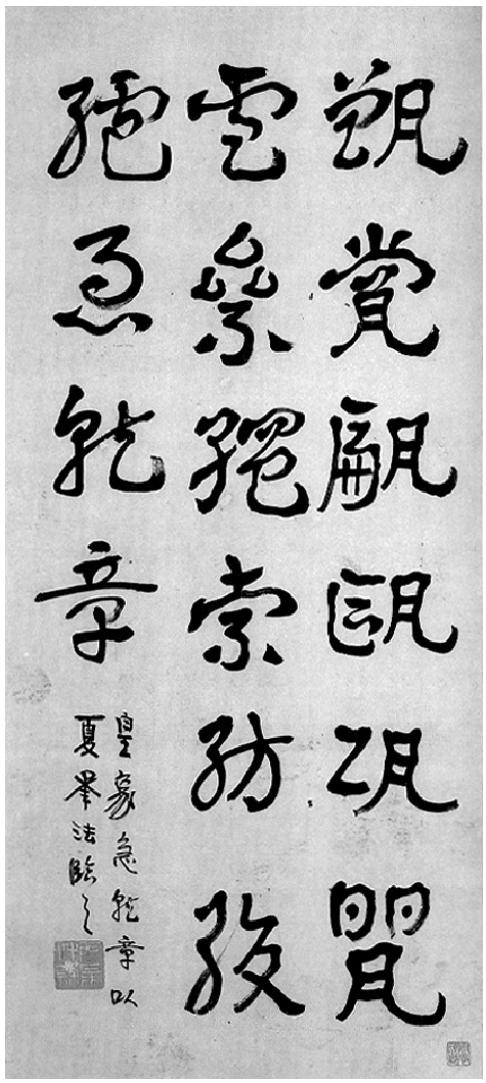


圖24　李瑞清《臨皇象急就章》。載Later Chinese Painting & Calligraphy, p. 13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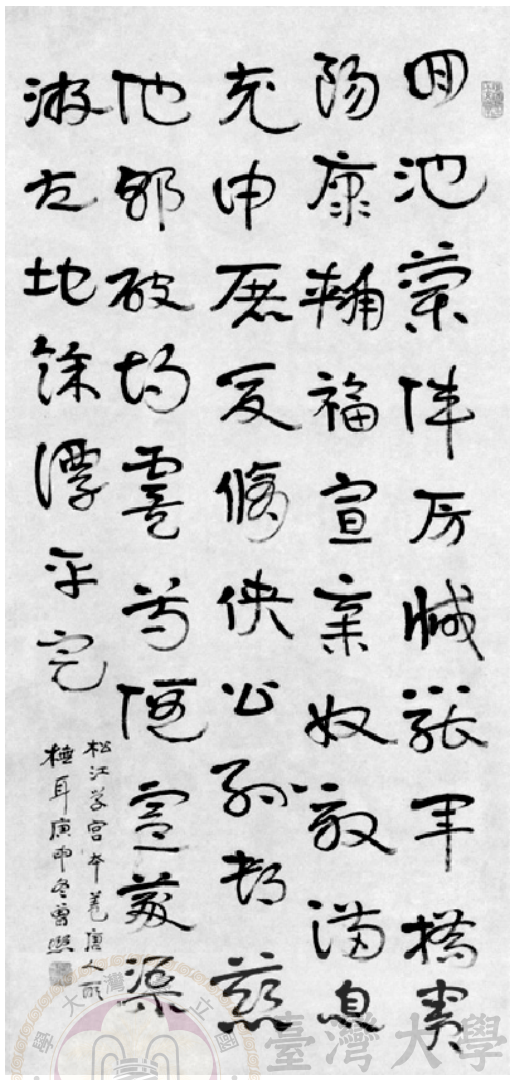


圖25　曾熙《撫松江學宮本》，1920。載《上海敬華2001年春季拍賣會—中國近現代書畫》，圖563。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ｱiｴfｻ･､､･indd　219　2005/12/5　､U､ﾈ 05:31:3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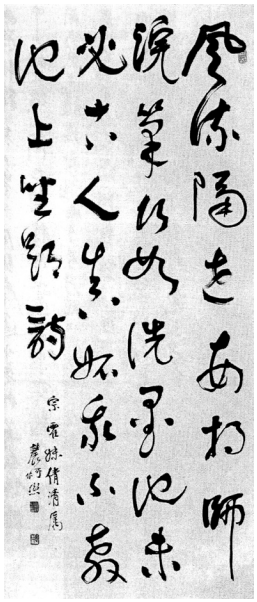


圖26 曾熙《草書》。載《翰海春季拍賣會2002(近現代)》，圖50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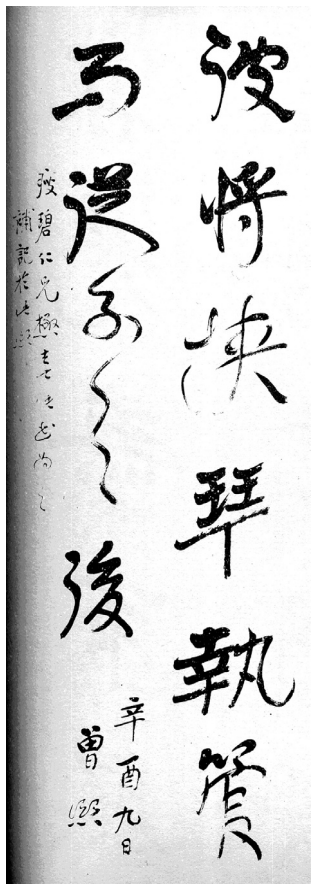


圖27 曾熙《行書軸》，1921。載《民國時期書法》(中)，頁342。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ｱiｴfｻ･､､･indd　220　2005/12/5　､U､ﾈ 05:31:4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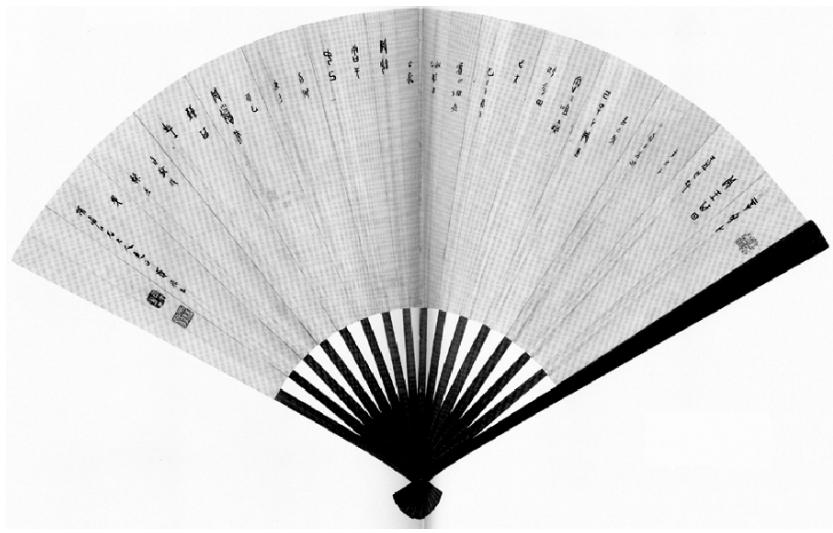


圖28　羅振玉《甲骨文成扇》。載《羅振玉/法書集》，頁50-51。



圖29 羅振玉《集甲骨文聯》，1923。載《集殷墟文字楹帖》。



圖30 羅振玉《集甲骨文聯》，1923。載《中國書法全集》(78卷)，圖66。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ｱiｴfｻ･､､･indd　221　2005/12/5　､U､ﾈ 05:31:4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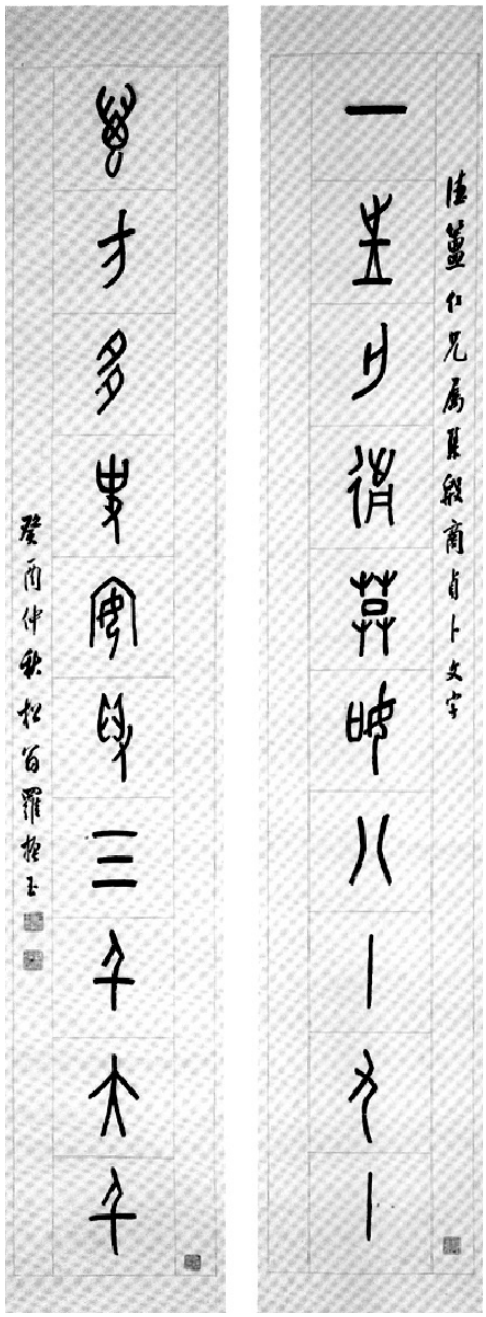


圖31　羅振玉《甲骨文十言聯》，1933。
載《羅振玉/法書集》，頁33。



圖32　孫儆《甲骨十二言聯》，1939。
載《上海工美’99秋季拍賣會》(1999.11.25)，圖800。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ｱiIfｻ･､､･indd　222　2005/12/5　､U､ﾈ 05:31:4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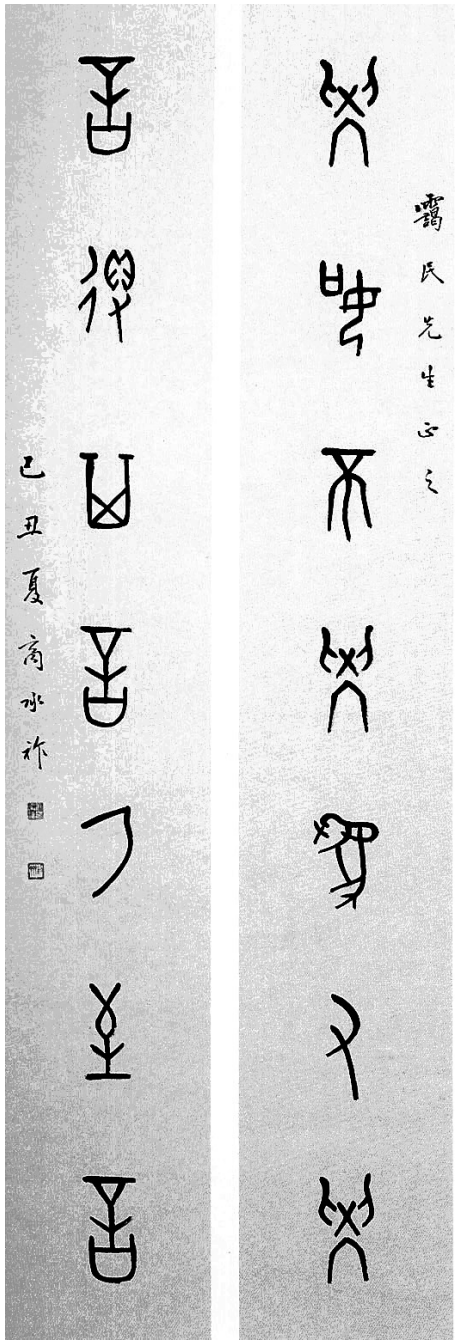


圖33　商承祚《甲骨七言聯》，1949。載《宗陶齋主人藏 —— 近代名家楹聯》，頁199。



圖34　丁佛言《甲骨七言聯》，1925。載，Later Chinese Painting and Calligraphy, p. 157.

臺灣博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ｱiIfｻ･､､･indd　223　2005/12/5　､U､ﾈ 05:31:4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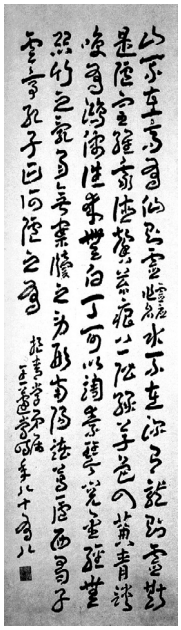


圖35　王蘧常《錄劉禹錫陋室銘章草軸》，1988。載《中國現代美術全集・書法》（二），頁131。



圖36　張大千《隸書七言聯》，1934。載《昆崙堂藏書畫集》，圖9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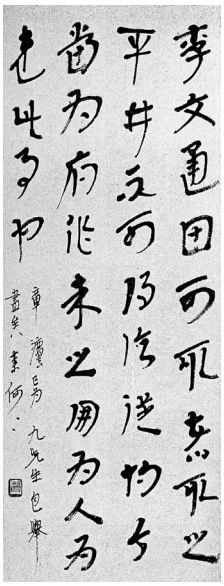


圖37　胡小石《臨漢簡》，約1910年代。載《胡小石書法選集》，頁37。



圖38　胡小石《行書詩軸》。載《中國現代美術全集・書法》（二），頁13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ｱiIfｻ・、、・indd　224　　2005/12/5　、U、ネ 05:31:47